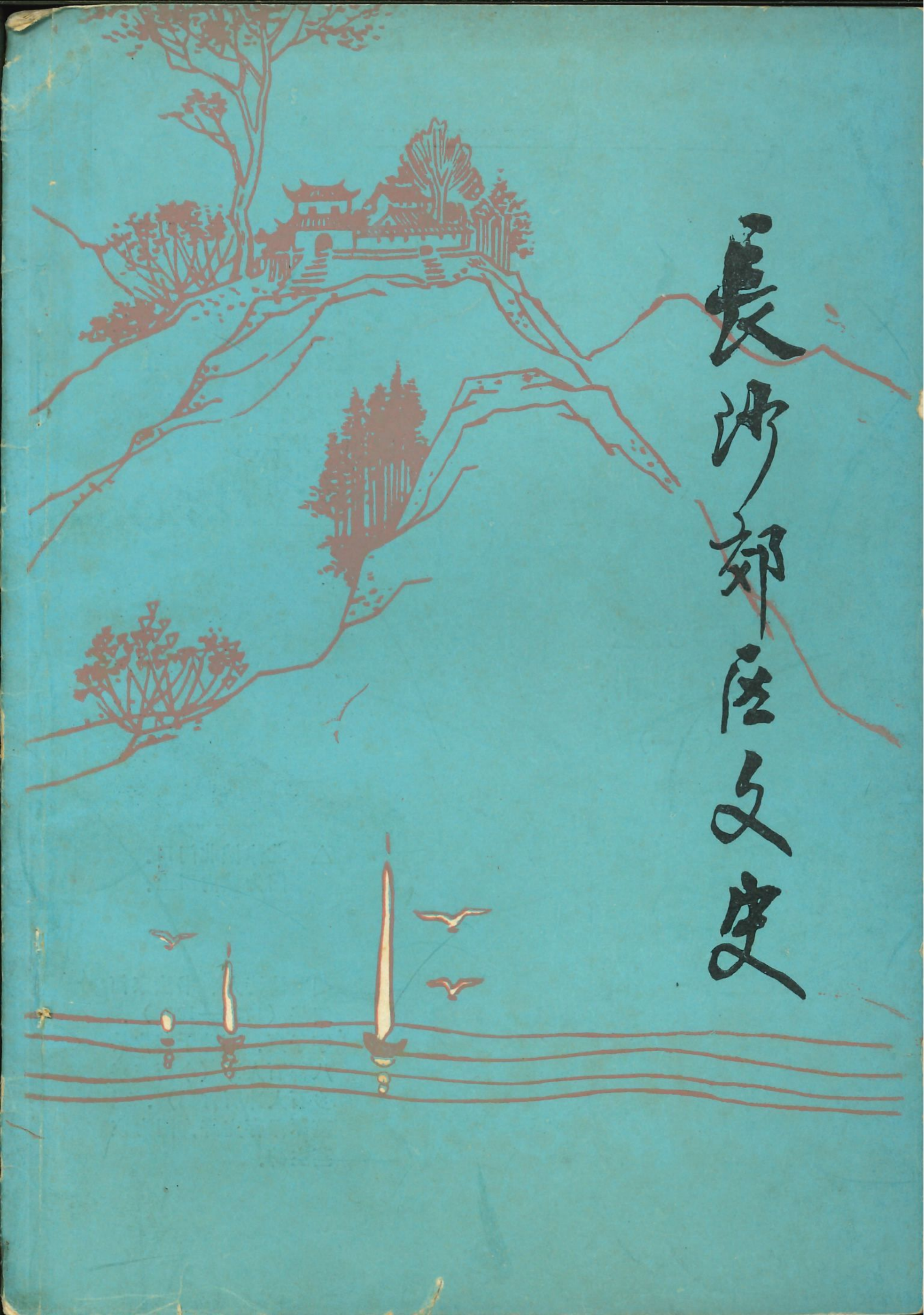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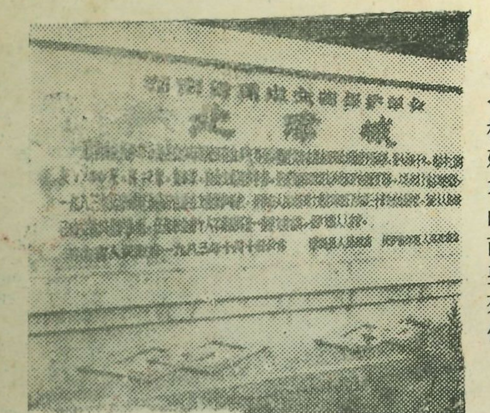

長沙郊區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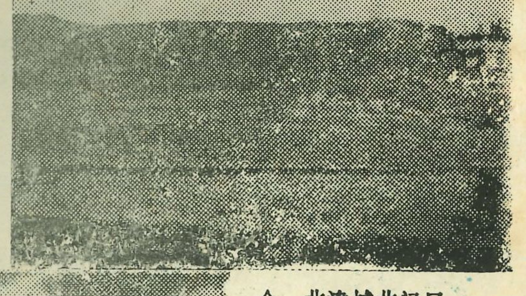


◁ 北津城位于我区岳华村与望城县谷山村交界处。建于西汉初期。现存土城长1750米，高12米，宽8米。内含文化遗存丰富，是研究西汉时期长沙地区历史的重要资料。1983年10月，该城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立此碑作标志。

长沙市郊区

文化遗存图片

（之一）



△ 北津城北门口。图为城内田土。

◁ 清诗人、书法家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墓葬于善化县八都石人冲（今雨花亭乡石人冲石竹塥）。现墓冢保存完好，图为该墓主碑。

长沙郊区文史

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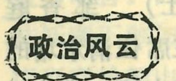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郊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目　录

政治风云

回忆录



毛主席在清水塘的生活片断

离休干部　梁宜苏

长沙清水塘革命纪念馆，是当年毛主席和夫人杨开慧同志的住宅，也是中国共产党湘区党委的办公地址。毛主席和杨开慧住在这里时，他们曾从事过许多革命活动，湘区党委的许多同志都来过这里；易礼容、滕代远等同志也在这里住过。现在，这里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革命纪念地之一。关于毛主席的早期革命活动，李锐同志已写过专著介绍，这里用不着赘述。

解放后，李锐同志为了搜集毛主席早期革命活动的资料，曾派我到韶山作过采访调查；后来省委宣传部和省委统战部联合邀集大革命时期和大革命以前的一些老同志举行座谈会，回忆毛主席和湘区党委以及大革命时期的党的活动，我协助李锐同志工作、参加了座谈会。我有缘得识王淑兰（毛泽民同志爱人，童养媳）、毛月秋、邹祖培（都是当年韶山支部党员）、蒋兆骧、廖如愿(都是大革命时期党员)、陈书农（新民学会会员）、甯纯宦（毛主席一师同学）、任树明（任树德烈士弟弟，当年泥木工人）等老同志；也分别访问了王季范（毛主席的姨表兄）、毛禹居（毛主席的堂兄）、李漱清（当年毛主席所敬重的进步小学教师、烈士李

耿侯的父亲）、杨明轩（当年韶山的进步人士）、邹香庭毛主席在清水塘时的老家人）、陶树清（毛主席住清水塘的房主）和易礼容等老同志。解放以前，我在清水塘一带住过两年多，对那里的环境也比较熟悉。这里，我就有关毛主席在清水塘生活片断记叙如下：

一九二〇年冬，毛主席在城南一师附小当主事（即校长）。他和杨开慧结了婚，住在沙河街天鹅塘旭鸣里四号。他们的结婚很简单，没有举行婚礼，只向学校的同事们宣布了一下，把两个人的被盖搬在一起就成了家。同事们来道贺，他们不接受送礼，也不设宴请客，只摆了一些茶点招待。因此，大家都说他们是新式结婚，打破了当时流行的封建旧式婚礼的老一套。毛、杨结婚以后，就向长沙一个商人陶树清租了一栋房子，是小吴门外城郊清水塘二十二号。这栋房子还刚刚建成，陶家因在城里经商，房子空着，就出租了。解放初期，我去采访过陶树清老人，他说那时毛主席已开始了革命活动。为了保守革命机密，他选择了距一师附小很远而僻静的清水塘；在租赁房屋时立了佃约，佃约上不是用毛泽东的名字，而是“毛石山”。照一般佃房常规付给押金佃钱。

毛主席在佃约上为什么要用“毛石山”的名字呢？当时在反动军阀政府统治下进行革命活动，不能不保守秘密，这是主要原因。而“毛石山”却也是毛主席小时候的乳名，他母亲毛文氏总是叫他“石山伢子”。相传毛主席诞生时，母亲有“梦日入怀”之兆；同时，其祖父毛翼臣公也有“金甲天神升堂上座”之梦。因而根据世俗封建迷信之说，此是大富大贵之命，各种妖魔鬼怪都是畏惧而妬忌的，它们必然会

进行暗害。因此，他一定要找一个“大神”来“保佑”，镇住妖魔不敢加害，才能顺利长大成人。于是毛文氏就把毛主席拜寄给韶山的大石山作干儿，请大石山来“保佑”，从此也就叫他为“石山伢子”。事情虽然荒诞无稽，但可以从这里体会到母爱之于子是无微不至的。而毛主席对母亲也很孝顺，感情至深。所以他有时也就以“毛石山”作自己的名字。

毛主席迁居到这里，周围是一片菜地。虽然清水塘的住宅门牌已有二十多号，但各栋房屋并不相连，都是稀稀落落地散布在菜园各处。这里座落在小吴门外郊区，有一条小路可通，距小吴门约二华里。沿小路走来，要经过上下相连的大小两口水塘边。塘的上头有一条小水沟，沿杜家山至袁家岭的起伏丘陵（现烈士公园经省政协至军区一带）的山脚而下，涓涓流水，注入到水塘中。因为是源头活水，所以塘水清沏，游鱼可数，故名清水塘。塘岸的小路旁，有杨柳数株，随风摆舞，似在迎送过往行人。

这里当时是僻静的。住屋座落在南、西、北三面菜圃之中，东面倚丘陵起伏之麓，有一条小路可通袁家岭。房屋是一栋木架结构的木壁瓦房，门窗有木格子构成的图案，冬天用亮皮纸糊着御寒。房的四周有砖砌围墙，头门也是木架结构，开向东方，与厅堂成直角。厅堂之前有块小坪，靠墙处有水井一口，生活饮用，汲水方便。出得头门，门前是一小块高低不平的草地，连接着前面的小丘山麓，那里葬有两冢清代官吏之墓。墓不很大，但也有麻石制作的墓围墓碑。墓上生着小草，小路从草地和墓葬旁边经过，通向袁家岭。

毛主席一家住在这里时，杨开慧烈士的妈妈住在这里，他们的长子毛岸英同志是在这里出生的。毛泽民、毛泽覃兄

弟在这里住过，杨开慧的同学戴本毓也在这里住过。戴离开后，曾在上海《国民日报》副刊上写过回忆文章，她怀念这里两口澄静如镜的清水塘。

那时，毛主席夫妇住在这里，正是中共湘区党委成立前后。毛主席与何叔衡、蔡和森、谢觉哉等同志在这里筹建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中共湖南支部及湘区党委；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和李立三、刘少奇、易礼容等同志领导过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等工人运动，取得胜利，成立了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在知识分子中，毛主席也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并附设有补习学校，用以提高工人党员和进步青年的文化知识。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团的组织活动，在都正街创办了青年图书馆。当时，杨开慧是毛主席的贤内助。他们一家，除了有邹香庭为其跑街、送信等外勤而外，一切家庭事务和哺育孩子的劳动，都由杨开慧和她母亲操劳。杨还要经常去都正街青年图书馆主持工作。

毛泽民、毛泽覃同志是怎样来长沙读书、参加革命活动的呢？当毛主席的父母先后逝世后，毛主席在外读书、作事，家里的财产事务，就由其大弟弟毛泽民当家。毛泽民同志是善于理财的，乡人都称他有“乃父之风”。他将家里的田产钱财管理得井井有条，不仅没有亏损，而且有所增益。毛主席在长沙结了婚，又在清水塘佃了房子安了家，就专程回到韶山老家来，作弟弟们的思想工作。他劝弟弟出外求学，不要在家经管家产，在经济上打小算盘。当时，毛泽民同志回答说：“我们出去读书，家里田产由谁来管？”毛主席说：“可以佃给老实农民，就由他来代管，他会管理得好好的。我们的租谷也可以少收一点，作为代管的报酬。”毛泽民说：“他管理得好，我们却少收了一些，我家哪里有钱用呢？”毛主席说：“你读了书，可以在外面作事，还要那些钱干什么？”毛泽民说：“不是我要钱，是这个世界要钱。我去湘潭买布买盐要钱，吃饭住客栈要钱；回来过银田寺打中伙要钱；连在如意亭店子里喝杯茶也要茶钱呢！”毛主席说：“你读了书，将来懂得许多道理，有了本事，使全国人民都生财有道，大家富了，你也就不会只看在这几个小钱了。”他还给弟弟们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说服毛泽民同志放弃了家庭产业，和小弟弟毛泽覃一道来长沙读书，走向了革命。他们来长沙也住在清水塘，他们是革命的一家，幸福的一家。小兄弟除读书外，还经常去都正街青年图书馆帮助杨开慧同志办理读者借阅手续。

在中共湘区党委的同志中，易礼容同志在这里住得比较久。毛主席住在厅堂的东首，易住在西边；他们朝夕相处，除了从事党的革命活动外，也还相与散步于清水塘的附近。易老说，毛主席的日常生活，除学习和锻炼身体外，喜欢在室外漫步，特别喜欢观火，赞美火的光明和威力。每当听到长沙城内有火警时，必叫易同出屋外，登上东面丘陵观看。有一次大火时，他一面观火，一面说：“火可以造福于人，也可酿成祸害。你看，这不是水火无情，生民遭殃吗？不知又有多少人无家可归?!”他是很关心人民疾苦的。

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长沙工人运动不断高涨，反动政府也加紧布置镇压。一九二三年春，湖南劳工会发动了长沙纺织工人罢工，军阀赵恒惕捕杀了劳工会的首领黄爱、庞人铨（二人原为无政府主义者，经毛主席长期工作，转向了马

克思主义；黄爱并已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并准备对共产党人动手。一天，正当赵恒惕派枪兵往清水塘出发捕人的时候，有地下党同志飞奔前来给毛主席报讯。就在枪兵快要到达清水塘前门的千钧一发之时，毛主席从后面翻墙而出，脱险了。

毛主席离开了长沙，被调到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杨开慧同志一家也就搬出了清水塘。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九四九年解放前的清水塘，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前面的菜畦没有了，两口清水塘没有了，柳树也没有了。它变成了长沙汽车东站的停车场和一块中间有个小水池（清水塘的遗迹）的荒坪，不过这里的地名仍叫清水塘。毛主席住过的这栋房屋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只头门从东向改为南向，移到了南面围墙的正中处。这里不远处有一条南北向的马路原是军用马路，路旁修建了许多商店和住宅，地名叫军路侧。那些房子离这里约五十公尺，与这栋房屋是不相连的。解放后，这里由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接管，经过修理开放，人们才知道是毛主席住过和湘区党委所在的革命纪念地。现在纪念馆内所陈列的桌、椅、床凳等家具摆设，都是按毛主席住家时的原貌复制陈列的。

毛主席在清水塘的岁月，是峥嵘的岁月。他和湘区党委许多战友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披荆斩棘地为党和革命事业开辟了前途，奠定了基础。他和杨开慧同志住在这里，志同道合，豪情满怀，夫唱妇随，为革命事业操劳，也享受着不同流俗的革命家庭乐趣；他对清水圹的感情是至深的，难忘的。毛主席怀念清水圹的遗作有《贺新郎》一词，我们读了它受到很深的教益，也更加深了对他的缅怀敬仰之情。

滕代远在长沙近郊区的几次脱险

一九二六年夏至一九二八年元月，农民运动的领袖滕代远活跃在长沙近郊区，带领农民起来革土豪劣绅、流氓地痞的命。“马日事变”后，他一方面将农协转入地下开展斗争，一方面秘密组织农民复仇大队，打击敌人，农民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人民热烈拥护他，可敌人听到他的名字就胆战心惊，对他刻骨仇恨。敌人出动大批人马搜捕他，还张贴通辑令悬赏捉拿他。可他沉着应变，以各种不同的身份食宿在群众中，行踪不定，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捕。我们所知道的就有六次。

第一次。“马日事变”的先一天，中共近郊区委的负责同志已听到了一些风声。五月二十一日，区委在韭菜园机关里开会，分析当时的形势，讨论应变措施。不料刚一散会，就被许克祥的反动军队包围了。敌人架着机枪往里冲，滕代远见势，即指挥大家撤退，自己翻墙逃走。

第二次。“马日事变”后的几天，滕代远正在枫树岸子（今雨花乡红旗村）长塘里桔子园易果生家里。突然叛徒任暮尧领一班枪兵前来搜捕。滕正与易谈工作，来不及躲避，便急中生智，立即上床盘腿，放下帐子，双手持枪，严阵以待。任暮尧在易家转了一圈，未发现踪迹，便凶狠地问：“床上是谁？”易果生镇定地说：“我叔叔，病几天了。”

任暮尧怕惹病，不敢近前，领兵走了。滕脱险为安。

第三次。滕代远、易正超、汪庆余等正在枫树岸子易八爹家以打牌为掩护研究工作。任暮尧带领团防局侦缉队又来抓人，一开始就围了屋。滕等人溜进后屋猪栏下阴暗的池里，用猪粪草盖住头顶，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第四次。攻打九峰镇团防局后，心狠手毒的团防局局长严寿成，为了泄恨，带领国民党士兵、团防局枪兵一百多人，直扑邬家庄，要捉拿滕代远、黎桂福、龙子安等人。滕闻讯忙躲在邬家庄秘书李申容家的夹墙逃脱。

第五次。六月初，叛徒带着大队人马又来枫树岸子捕捉滕代远。正在易果生家商议事情的滕代远闻讯后，立即换上易果生父亲的衣服，从壁上取顶破草帽戴上，腰系鱼篓，装着捉鳝鱼的农民，弓着腰从熊家的稻田里从容地避开了敌人。

第六次。领导大坨、洞井、白田铺一带的农军攻打九峰镇团防局的李海双，原农民协会南路十三团总团长，被敌人抓去坐了三年半牢。在他被关押期间，有一次，滕跟着李海双的儿子李向荣去探监，与李海双谈了十来分钟就走了。这事敌人很快发觉了，就拿起枪跟着追，机智的滕代远又一次甩开了敌人。

滕代远在这期间，象这样冒着生命危险领导近郊农民坚持斗争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艰苦的日子，残酷的斗争，不仅显示了我们这位农民领袖的胆略和才识，也锻炼了近郊农民革命的斗志。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抗敌，把革命的烈火烧遍全郊。

（郊委党史办供稿）

近郊农民复仇队
三次袭击九峰镇团防局

大革命失败了。农民协会被迫解散，农军扑长沙城也失利，国民党的反动气焰顿时又嚣张起来。他们与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互相勾结，一个充满血腥气味、肮脏透顶的反共团防局在九峰镇（今大坨乡九峰村）大打出手了。浓重的政治恐怖气氛笼罩着近郊区，但是，真正的革命者无所畏惧。在近郊区农协委员长滕代远的领导下，农协会员们组织在一起，成立了复仇队，与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说："敌人搞白色恐怖，我们就搞红色清乡。"他们计划夺取敌人枪枝，充实自己武装力量，用以克敌制胜，曾三次攻打九峰镇团防局。

第一次。一九二七年八月的一天夜晚，共产党员龙子安，接受了滕代远和易正超的指派，带领了几个队员，悄悄摸到九峰镇团防局。他们翻墙进院，凿壁入室，正待取枪外运时，被值班的团丁发觉。在一阵乱喊捉贼声中，队员们只得退出狼窝。

复仇的烈火并没有因第一次的失败而熄灭。复仇队员们决定再次作战斗准备：汪庆余去浏阳买来鞭炮，易正超在长沙北门做好了土地雷，并要易雨田装扮成上次偷九峰镇团防

局枪枝被抓获的“盗贼”。一切就绪了。古历七月初的一个夜晚，复仇队员和农协会员共三百多人，一个个背着梭标、竹杪，赶到麻子坡（今赤岗冲）集合。滕代远作了战前动员，公布了行动计划。大家歃血为盟，喝雄鸡血酒，发誓战斗到底。午夜一点多，领队的黎桂福“押”着“盗贼”，从麻子坡出发了。他们经石马铺、井湾子，约摸两三点钟光景，队伍开到了九峰镇杨家祠堂。由于和靖团杨新阶之子杨菊生告了密，敌人早有戒备。当队伍进到离祠堂百来米时，敌人开枪了。大多数队员没见过这场面，吓得往回跑。剩下的二三十个队员冲到祠堂后的壕基下，向后屋甩地雷，但屋中静悄悄的。有七、八个队员摸到寝室，用手电一照，床上空荡荡的，一支枪也没有，他们被团丁们包围了。黎桂福沉着指挥撤退，不幸腿部受了重伤。易雨田不幸被捕牺牲。夺枪的计划又没有实现。

后来，大托、洞井、白田铺一带的农军在李海双的带领下，进行了第三次攻打九峰镇团防局的战斗。这次是采用硬攻的办法：包围团防局，用大鞭炮、三眼铳和少数步枪一齐向敌人开火。但由于人多枪少，也没有取得胜利。

农军三次袭击九峰镇团防局，顽强勇敢，斗志坚决，经起了严酷的考验，其精神实在可敬可佩。虽然，他们没有缴获敌人的枪枝，但也沉重地打击了反革命嚣张的气势。他们在斗争中锻炼了自己，在实践中探索着对敌斗争的正确道路，为以后夺取胜利总结了经验。应该充分肯定：他们这几次战斗，在近郊区农运史上，展现了光辉的一页。

（郊委党史办供稿）

靳江河武工队

郊委统战部　**于绍顺**

解放前夕，在长沙市郊区岳麓山下的靳江河畔，有一支地下武装组织——靳江河武工队。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进行革命宣传；缴获、夺取国民党军队以及地方势力的枪支弹药，收剪敌人的电话线，打击敌人。他们维护地方治安，保护人民群众安全，为促进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靳江河位于岳麓山东南方，桔子洲头上游，是通往坪塘、九江的必经之路，也是渡过湘江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一九四九年四月，当我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一举解放了反革命统治的中心南京，蒋家王朝临近彻底覆灭时，一批又一批退逃的国民党匪军来到靳江河，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情况十分严重。正在这时，中共长沙县委书记刘建安同志指派梅溪区区委书记孔福生和区委委员杨东泽俩同志来到靳江河，会同靳江区区委书记吴福成同志商议：为了掩护我地下活动，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维护社会治安，决定成立一支武装组织，取名为“靳江河武工队”。

一九四九年五月，该队在靳江河林家台子谭松同志家举行组建会议，吴福成同志宣布“靳江河武工队”正式成立。

靳江区第四支部书记刘致贵同志任靳江河武工队队长，吴福成同志任指导员。武工队共有成员二十多人，分成两个班。刘秉坤同志任武工队副队长兼一班班长，刘金亮同志任二班班长。队员以农民为主，并有少数居民。地下党员占百分之八十。个个苦大仇深，对国民党恨之入骨，是一支勇敢的地方部队。

当时国民党七十三军驻扎在靳江河、杜家塘、左家垅、金牛岭一带。区委统一部署：采取政治攻势，要在同一晚上，把标语贴到敌人鼻子下，即沿湘江河西岸，从南到北三十余里各个要道。任务十分艰巨。地下党员、武工队副队长刘秉坤同志当晚冒着大雨，抄小路悄悄地往伪通讯班驻地宋家茶铺走去，不料被敌人哨兵发觉。"什么人，干什么的?"刘秉坤机警地答道："老百姓，到保长家有事。"敌兵听说是找保长的，就没再追问了。过了岗哨，他把随身带的浆糊往壁上一涂，将一张写有"解放军近日抵长。长沙要解放了，国民党很快完蛋了"的标语，迅速张贴在宋家茶铺的墙壁上。

第二天吃过早饭，群众围在宋家茶铺前面看标语，刘秉坤在其中大声地读着。大家高兴地议论：解放军就要来了，国民党的日子不长了。

同一晚上，在靳江河、赵子港、左家垅、溁湾镇、银盆岭、三汊矶、金牛岭、学士桥、坪塘、车塘河、象鼻嘴等十多处，都有武工队队员去贴这样的标语。伪七十三军在武工队的政治宣传攻势下，吓得连夜集合部队往邵阳方向逃跑，敌通讯班的电线也来不及收拾。敌人丢下电缆线三、四箩筐，子弹五百多发，武工队第一次行动就取得了胜利。

一九四九年七月，武工队开展了收缴武器弹药的活动。

武工队派出情报员谭海云和周友余两同志到敌人内部进行侦察，发现哪里有枪弹就想方设计去夺取。有一天，谭海云前来报告：在杜家塘祠堂的伪第三十四师仓库，只有一个叫胡疯子的保管员看守。胡疯子是一个酒鬼，十分好酒，总是一喝就醉。听到这个情报，刘队长想出了一个夺枪的妙计。

第二天下午四、五点钟，刘秉坤、周明亮两同志，一人提着酒，一人拿着一大包点心，往杜家塘仓库门前走去。胡疯子一见有人提着酒，馋得要命，连忙从传达室窜出来要酒喝。刘秉坤、周明亮见中了圈套，心里暗暗高兴。于是跟着胡疯子进入传达室里，三人一同喝起酒来。胡疯子一个劲地喝，他俩一个劲地敬，直喝到晚上十点多钟。这边在陪胡疯子喝酒，那边有刘致贵、刘桂华趁机翻进围墙，撬开了仓库门，敌人已把大批的武器弹药转移了，仓库里只剩下十一支三八式步枪，两百多发子弹。待这些枪弹转走，胡疯子已醉成狗似地睡在地上。天明了，胡疯子酒醒，发现仓库门撬开，枪弹全空，断定这是共产党干的，也吓得丢下仓库，随军跑了。事后，刘队长风趣地说："我们只损失了两瓶酒，一包点心，换来了这些枪和子弹，真是合算啊！"

七月的一天，谭海云又侦得一个可靠情报：岳麓中学校长罗东厚已逃跑。逃走前，把十三条步枪交给了左家垅保队副张长风保管。刘致贵和吴福成商量后，决定集中力量把这批步枪夺过来。他们带领二十多个威武的武工队员，到保队副张长风家，好言劝说，交出藏枪。开始，张长风十分狡猾，说家里没有藏枪，可以搜查。武工队员见这家伙顽固，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刘致贵把张长风带到山上，警告地说："我们早已知道罗东厚的枪交给你了，你要老实点交出来。

如果抗拒，今天就毙了你。”张长风听了吓得浑身发抖，连忙说出了藏枪的地方。这批枪支被全部缴获。

在收缴枪支弹药的过程中，武工队长单枪匹马夺了伪乡长、中统特务廖梅生的一支手枪；队员们先后六次缴获国民党地方武装三十余支枪和大批子弹，以及五十多套伪军服装。后来，武工队员每人有枪弹，全部武装起来了。

七月下旬，伪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司令蒋伏生跟随王杰窜到邵阳，派飞机在长沙丢下反革命传单，用以恐吓共产党和人民，反动传单的内容是：命令国民党散兵归队，谁带一个排归队奖光洋一百二十元，带一条枪归队者奖光洋十二元。妄图集中兵力进行垂死挣扎。当时，湖南程潜、陈明仁将军暂未起义，形势紧张。在这紧急关头，我靳江区委在曾家坡（今岳麓渔场）桔园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支部发动全区二百多党员积极行动起来，向群众进行宣传，并教育群众作好思想准备，警惕敌人反扑，到时候武工队员们也决心抛家别子与解放军一道向顽敌斗争到底。刘致贵更充满胜利信心，引出孔福生同志在槊梨搞地下工作时的一首打油诗：“离开陶公庙，别了明道乡；革命不胜利，永不回故乡”。接着朗诵了自己编的：“坚持游击战，抢登岳麓山，长沙不解放，永不下战场”的打油诗。他们将要采取积极行动的时候，正宣布湖南和平解放。

解放后，长沙县人民武装部将这支地下武装收编为长沙县第三区人民政府基干队，刘致贵同志先后任基干队分队长、三中队队长。吴福成同志先后任基干队、三中队指导员。这支队伍又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中，继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义胆忠心龙子安

区政协委员　**涂华生**

龙子安生于一九〇六年，家住长沙南郊邬家庄（今属南区红旗开发区），是个泥瓦匠。他生得体格魁伟，力大过人。从小习武，功夫高超。由于他从小靠做工为生，受欺侮、受剥削，日子苦不堪言。因此，他对旧社会和剥削制度极为痛恨。一九二六年十月，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担任长沙近郊农民协会委员长滕代远同志的警卫员，曾参加过多次重大的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九月，郊区农民复仇队组织三百余人攻打九峰镇，因走漏消息，战斗失利。但大部分复仇队员仍积极进行地下活动。伪九峰镇团防局局长严寿成是国民党镇压农民运动的有名刽子手。他借助国民党军队的势力，天天带人清乡，搜捕共产党员，作为对农民复仇队攻打九峰镇团防局的报复。

十月的一天，严寿成听说滕代远、龙子安等人藏在邬家庄，马上率领一百多名反动军队和团防局枪兵，悄悄包围了邬家庄。滕代远、龙子安等人得到消息，赶快分头躲进农协干部李申容家的夹墙里。严寿成指挥人马把邬家庄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滕代远和龙子安。诡计多端的严寿成不肯罢休，叫人拆墙、挖地洞，终于找到了龙子安。严寿成知道龙

子安是滕代远的警卫员，又是两次到九峰镇搞枪的主要骨干，因此，见抓到龙子安，他十分高兴，并吩咐部下继续搜索。“龙子安在这里、滕代远也一定会在这里。”他对部下说，“不抓到滕代远，决不罢休。”

龙子安急了。他知道，如果敌人再找下去，不要多久，滕代远同志一定会落入魔掌。为了救首长，他机灵一动，对严寿成说：“滕代远到外地开会去了，这几天都不会回来。严寿成对他的话将信将疑。龙子安又说：“你们这么乱找是费空力，累死也不值得。”敌人见他这么说，加上找了很久，的确不见滕代远的踪迹，便都泄了气。严寿成没办法，只好叫人烧了另一个复仇队员黎桂福家的被盖蚊帐等；押着龙子安回九峰镇去了。

严寿成很想从龙子安口中得到有关滕代远和复仇队员们的情报，软硬兼施。几次审讯龙子安，但龙子安根本不开口。严寿成又气又急，又无可奈何。他知道龙子安武功好，又练过气功，为了防止龙子安跑掉，他叫手下赶快杀死龙子安。

团丁们将龙子安押到附近的杨家冲栈坝上，冷不防朝龙子安身上一枪。龙子安忍住剧痛，就地一滚，冲下栈坝，然后，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去。他这种勇敢的举动是敌人怎么也没想到的。团丁们一个个又震惊、又惧怕，呆呆地站着，一时竟不知怎么办才好。龙子安飞也似的向前跑着，很快就跳过了一条港，跑过了一条垅。这时，团丁们才从震惊和慌乱中清醒过来，一齐操枪朝他乱射。龙子安周围没有一点可以掩护的物体，身中数弹后，慢慢地倒下了……

龙子安同志为了保护首长，为了工农大众的翻身解放，这个二十一岁的共产党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回忆录

我在长沙郊区的革命活动

离休干部　**赵连生** 口述

编者按：赵连生同志于一九三〇年夏参加刘长云所率浏阳西乡总指挥部，在一大队当红军战士。他曾随部队转战于善化、浏阳、醴陵一带，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两次进攻长沙，与国民党地方武装、团防局作过剧烈的斗争。后因伢子山一役受挫，队伍离散，于是年冬来我南郊。及至长沙和平解放约近二十年，其间作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兹选刊他的部分《回忆录》，题目为编者所加。

我，株州出生，浏西长大。今年七十八岁。到长沙郊区已经五十多年了。这里，说说我怎么来郊区的和来后的一些活动。

离乡背井　逃出虎口

一九三〇年秋，彭老总率红三军团两打长沙。撤走后，镇头市转眼变成血雨腥风的世界。哥哥赵梅生（已故），一九二七年搞农协当过纠察队员。我当过红军战士。兄弟俩是张梅村（全县最顽固的团总，当时浏西的剷共委员）的死对

头。他多次派人抓我们。抓不到，只苦了父亲在牢房里遭活孽（后保释）。我东躲西藏，不敢落屋。一个咯大的浏阳县，竟没有我安身之所。我决定：远走他方，逃出虎口。

投奔红军　历尽艰辛

那年初冬，我单身混过层层关卡，来到长沙南郊黄土岭垱子塘（今政干校校址）姨母家。正巧，姑表兄王少福也来这里。他也是当过红军逼得走投无路的。两人一见，话很投机。提起辛酸往事，商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天麻麻亮，姨母披衣起来轻声问道："往后，你们怎么打算？"我们异口同声："寻找贺龙，投奔红军！"

贺龙在华容，我们探准了这个喜讯，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那天一早，我们搭上去草尾的轮船，以为最多三两天便到得华容。谁知河干水浅，还不到中午，轮船搁浅在甘家港沙滩上。走！赶路要紧。我们一口气奔到沅江。

第二天，我们渡过三仙湖，到草尾起坡，太阳快要落水。两人探着去华容的方向，夜晚伸手不见五指了，才摸近一间草屋问路。一位老娭毑连忙把我们引进屋里，细声说："听口音你们是南边来的。来得不是时候啊！堤防局的人经常来查夜，不准民家留歇客。看外面墨黑的，你们赶路不行了，就在我家歇了，明早再走吧！"

第三天拂晓，老娭毑的儿子给我们指路。到了青鱼嘴，天已煞黑。离乌嘴还有五里，我想起房叔有个邻居叫李二黑皮的，早年从浏阳柏家山下来，落在杨家垸。杨家垸就在附近，何不找个熟人探点情况再说。王少福非常同意。我们很

快到了李二黑皮家里。可是李二黑皮不在家，去洲上砍芦竹几天了。他爹一听我们说的，只好留歇。饭后，两个汉子闯来，虎里虎气的。有个说："二位请教？有何公干？请借放行一看！"我们被突如其来的盘问愣住了。黑皮爹一旁帮我们回了些话。那人接着问："镇头市的胡美臣、柏家山的李和生、土桥的陈安和，二位见过么？"王少福摆头，我却镇定下来了。我想：胡美臣是浏阳篾业工会的，见过；陈安和当过红军十七分队队长，也见过；李和生住柏家山湘阴塅，我还在他家吃过饭。于是，我对那汉子说："老兄。莫再盘问了。你说的我个个认得。今日不瞒你，我们是来投奔红军，去找贺龙的。"那汉子听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的声音变柔和了："二位想到宋家嘴那边去，那是肉包子打狗，白送了呵！……今天乌嘴街上还毙了两个，都是想往那边跑的。现在交通已断，奉劝快回长沙。"他的话象一瓢冰水，从头上淋到脚跟。王少福和我心都冷了，半天无话。"刚才提到的三人，不知二位愿见见么？"那汉子开腔了。我们连连点头。于是被他领着摸了一段黑路，来到另一人家。一间小屋里，煤油灯下坐着好些人，加上我们挤满一屋。刚才提到的那三个人果然在场。见了面，打个招呼，都没有心思多讲话。原都是兴冲冲投奔红军来的，谁知到了这里又被国民党把去路截断。此刻，都好象心上压着一块大石头，憋了一股闷气。在谈话间，我才探清与我们说话的那汉子叫李美田，是黑皮的叔叔。这时，李美田凑过来向我们说："方才大伙商量过了，目前只有回长沙这条路走。"

第四天，我们又长途跋涉。赶到草尾搭船返回长沙。

草尾到长沙是逆水行舟；河又干，水又浅。是什么时候

开的船，上了几回滩，驳了几只船，赶了多少路，饿了好多天，……都记不起。船到长沙，上了码头，王少福与我分了手，他逃到攸县种田去了。

重操旧业　广结兄弟

挨着姨母家，我在黄土岭附近佃屋住。找不到红军，只能捡起老行当。我从小学的是篾匠，年青又有力气，不愁赚不到一碗饭吃。我的老表王庆生，种菜上街卖。有一天，突然得到了一个喜讯：是老表告诉我，他在街上卖菜，碰到我爱人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张梅生抓我的时候，爱人周玉莲在家呆不住，也逃到长沙城里，在彭家井刘老太爹家里做女工。老表的话音一落，我立即就把玉莲接了回来。张梅村把我们夫妻拆散了半年多，终于团了圆。

玉莲一回来，我们就在黄土岭铺上佃了个门面卖点篾货，生意也做活了。日子长了，也交结了不少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有种菜的、卖荒货的、开店铺的，还有教书的。尽管大家职业不同，想红军、盼翻身的心情却和我一样强烈。

光荣入党　终身革命

我到黄土岭只六、七年，结识的阶级兄弟有一大串。在浏阳驾船的张玉林，介绍我认识了开红纸铺的张友初（周里同志的交通员，已故），房东肖正德（地下党员，已故），引我和卖豆芽菜的黎桂福（地下党员，解放后在摊贩联工作，已故）交朋友。（张友初和黎桂福是我以后加入党组织的介绍人。）还有谢介眉、张洞初、王汉臣、张德美、吴又

桃（以上均系地下党员，已故。）等，都是我家的常客。

一九三八年初春某天早饭后，黎桂福到我家来了。和住我后房的房东肖正德，一行三人来到窑岭上胡月楼（地下党员，后在狱中牺牲）的家里（现湖橡对面空坪）。胡月楼、张友初、张洞初正等着我们。

午饭后，张友初领我读誓词。大意是：服从组织，严守机密；牺牲个人，永不叛变。为革命奋斗终身”。从此，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共长沙近郊区组织。以后，每月交五分钱月费。我听过两次徐特立同志的报告，贴过李宝生（菊钦）书写的标语，开过会，送过信，搭过台让爱国的大学生讲演……。总之，我接受张友初的指示，完成他交给我的一切任务。时时牢记入党时的誓言，要为革命奋斗终身。

设点联络　展开活动

在国民党反共逆流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党组织作出了隐蔽转移的决定。张友初嘱咐我一些事以后，同志们都暂时分散了。风声最紧的年头，我两口子跑到老家长沙县嵩南乡（现株洲高塘），做点手艺隐蔽。

一九四五年春节后不久，分别已久的张友初好高兴的奔来找我。一见面就偷偷告诉我："我们的队伍回来了！你要回长沙去开展工作。"听了这个消息，我喜得流出了眼泪。张友初临走交代我，必须次日回长沙，到义坡（太乙寺的西南方）做皮纸的唐祝林家找他。

我依时赶到了唐家，第一次会见了一位叫唐先生的（即周里同志），还有他的爱人常杏云。刘建安（当时长沙县委负责人）也在那里。互相认识以后，由张友初向我严肃

交代："你要尽快地想办法在南湖港茶亭子（黄土岭以西）搭间房子安下身来，建立我们的一个联络点。任务是八个字：调查、接待、组织、串连。

我赶紧下了乡。在老家砍了几根树，买来几捆杉木皮，请了两个工，搭起了一爿篾货铺。这就是我们地下党同志开展工作的一个联络点。周里、常杏云。沈瑛、刘亚球，还有一些不知真名的同志，经常在这里出没。张春廷。王庆生、徐冬生、罗金生、王开连、王开明、唐兴祥、张福初等人，通过串连，都先后吸收了他们为中共地下党员。以上这些人编为上级党秘密划定的太乙寺支部。命我为支部书记，王开连为副书记。

爱人玉莲是我们最忠实的战友。她非常机警，出现什么情况，她从外面打鸡骂狗地向屋里报信。她热情招待来"客"，有时还省着饭菜让给"客人"吃。每天晚上，我和玉莲在灯下做篾货。铺上的人都知道我家是做手艺的，查户口，查夜的，从来不进屋。我们党的这个联络点，虽然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却掩护得象铁桶样的严密。

夹底皮箩　传通密件

周先生(李林，地下党员，当时任湖南游击总队司令，解放后病故）经常"光顾"我这个小店的"生意"。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一九四七年夏季的一天，周先生又来定货了。他对我说："打一担皮箩，要夹底的。三、四天取得货么？"我心里盘算："时间是够的，只是这夹底还没打过。夹底箩，准是要夹什么在底下。这是一个特殊任务，再困难，一定要想方设法打出来。于是，我满口答应："过两天来取

货！"

我日赶夜赶，按期赶出来了。周先生满心欢喜地挑走了这担夹底皮箩，以后怎么样，我没打听过。

十几年过去了。一次，我有机会到了中共省委所在地——蓉园。"夹底皮箩想是你打的"，周里同志与我谈笑间提起了往事。接着他告诉我，他与这担夹底皮箩遇到过两次惊险。

第一次，他躲在厕所里，掀开皮箩的夹底，正把党的机密文件塞进去的时候，正巧碰上宪兵来查户口。他急忙出来打招呼。宪兵闻到厕所那股臭气，查完户口就走了。

"第二次"，他继续说，"我和另一位同志一道去岳阳，也是挑了这担皮箩。路上，经过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岗哨。士兵要检查，想得点外快。揭开一头，装的是豆豉；揭开另一头，是一箩干辣椒。他捞不到什么，骂了一声妈的×，朝皮箩猛踢两脚，豆豉、辣椒撒满地……"说到这里，他表扬了我："你的手艺真不错，打的皮箩结实。那夹底里的东西踢也有踢得出来。"

紧急关头　智转粮食

"不好！唐先生那里要出事啦，快跟我去。"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的一天清早，张友初急急忙忙地跑来对我说。

唐先生夫妇住在北郊西宁街广益中学对面一栋两层楼的木屋里。房东谢义（女）是常杏云的亲戚。楼上住人，楼下搞营业。铺面半边堆了一囤米，他们借卖零米遮身，在那里开展地下活动。不久，被国民党发觉，暗里对米店进行了监视。唐先生发现这一情况，全家当晚就搬走了。

我从来不知道唐先生的住处，也不去打听。听张友初一

说，只好跟着他走。一路上，他把来的任务告诉了我："要想方设计把米转走。"

我们赶到西宁街。谢家的楼下，张洞初在那里踱来踱去。分明张洞初是张友初的亲哥哥，他们见面都装作不认识。我们瞅了铺店里那囤大米一眼，转身拐过三角塘，在不远的地方，雇来了三辆板车。

我们一本正经地演戏给别人看。

"哪个是老板？"张友初冲着张洞初大声问。

"你们是哪里的？"张洞初反问我们。

我大声回答："我们是碧湘街大华玻璃厂的。"

"么子好事？"张洞初又故意问。

张友初指手划脚地责备："你们店里太不讲信用。早就交了二十石米的钱给你们，讲好哒昨天送米来，何什冇送？"

张洞初连忙"赔不是"："出动两位，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雇了车，见凥吧！"我和张友初几乎同时说。

张洞初一层一层拆下囤米的茓子。拖车的三个工友也帮着灌凥桶，撑袋口。一囤米很快装进了十七个布袋，抬上了板车。

三车米，拖的拖，挝的挝，从北门外运到了南门外。不到吃中饭，米已卸在书院坪费家巷子胡家糟坊的铺房边，交给了胡福大。原来这糟坊是黎桂福的姐夫胡九爹开的。收米的人便是黎的姨侄。

这件事，正好发生在常杏云同志生孩子后的第三天，唐先生给新生的女儿取了个名字，叫做"西西"。（长沙人口白，出了西西，就是出了问题。）周西西同志现在湖南电影

机械厂工作。

掩护同志　照顾山亮

一九四八年七月间，周先生带着爱人谷芳（现机械工业厅离休干部）、儿子山亮（现在湘绣大楼工作），挑担铺盖，从岳阳来到我家。他们一进屋，十来岁的山亮连声叫脚疼，快要落月的谷芳也倒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吐着气。看那样子，旅途非常辛苦。

周先生放下担子，寻菜刀杀了带来的两只鸡，他们想吃顿如意的饭菜，来为这次安全转移庆幸一番。

朱德贵（解放后处决）住在我家的屋后方。他是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东方服务组的负责人，又是当地的保长。他暗中注意着我家不寻常的热闹场面。

"他们是什么人？"朱德贵从我屋后门溜进来，朝着我问道。

玉莲机警嘴快，抢在我前面打接应："啊！咯是我娘屋里叔叔，……他们在外面做事，要回家去，路过这里来看看我们。"我也向朱德贵介绍，顺着说："那位就是周先生。"朱德贵连连点头："哦，是的，赵老板娘子娘屋里姓周，是的。"

朱德贵走了。这顿饭大家吃得并不很痛快。饭后，山亮留在我家里，周先生夫妇匆匆离去。

十来天后，谷芳显得十分焦急的神情，出现在我家门口。她装着买馒货来探望儿子。我不在家。玉莲告诉她：先天来了个农民模样的人，已经把山亮接走了。她听罢，才舒展眉头，立即告辞了。原来，她已被捕。因即将分娩，国民

党把她送到陆军医院。好心的护士（注：该院有地下党员）觉得她是受牵连，怪可怜的，就让她自己出来买棉花、草纸，才溜到我家探听儿子的下落。后来谷芳生下孩子，从医院趁机脱险。

智斗保长　缴获枪弹

长沙和平解放前夕，朱德贵注意我，我更注意朱德贵。

我家屋前不远，有一块大空坪，朱德贵经常在那里喊着“一、二、一”，操练反动的青年救国军。那时，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白崇禧的军队撤到了长沙，还将继续后撤。我耽心白匪军的撤退会把朱德贵的枪枝带走，时刻在打着主意。

朱家和蒋七爹共屋连居，似乎互相有照顾。其实，两家人都长的野猫子脚，经常不落屋。一张破大门敞得开开的。朱德贵的枪枝就挂在墙壁上，只要瞅住机会，偷来不费力气。不过，我不会那样干。

过了一些日子。一天，朱德贵两口子从外面回来，我向他们招呼。互相走近了，我悄声说：“早一阵子，来了个陌生人，问朱德贵住哪间屋。以后，我跟着他，看见他把你墙上的枪枝号码都登记去了……那人莫不是共产党派来的便衣，你们要注意！”朱德贵一惊，“真的？”“我几时说过假话。”我平常是爱开玩笑的，但就是没有和他开过玩笑。他信以为真，皱起了眉头。我装着关心他的口吻：“不要急。朱保长，你为人好，谁不知道。只要把那枪保管好，共产党来了交出去，还会把你怎么样？”他听了默默地点头。

过了些日子，朱德贵墙上的枪不见了。

又过了些日子，解放军进驻长沙，黄土岭一带都扎着我

们的部队。朱德贵看见党政方面一些人常来找我接头，有一天，他也主动来找我“接头”。

“我藏的那个……”

“那个什么？”我故意问。

“枪啦，你……看怎么……办？”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叫他继续保管好，听我的讯处理。随后，我把这事向张友初作了报告。

一天，一辆人力车停在朱家门口。张友初和我一道，叫朱德贵把所保管的枪弹全部交出来，放在车子上。我们押着这辆人力车，送到了又一村五堆子公安部门指定的地方。

我们转回到茶亭子，朱德贵在家不安地等候。他抖动双手，捧过我们递给他的一张收条。上写：“……步枪六支、子弹带七根、子弹一大箱、迫击炮弹两发、手榴弹三枚……”

（李炎坤、张若曦纪录整理）

十年战斗迎解放（上）

钟昌前

编者按：本文作者早在抗战初期参加革命工作，并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教学经验，曾荣获省、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等光荣称号。现在我郊离休，兼职民进省委常委、市委主委和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常委。本文撰述他解放前十年中亲身斗争经历。后半部尚待整理，下辑续刊，特此注明。

一、清风岩洞入党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湖南汝城县私立启明中学（今县立二中）读书。1938年冬，学校领导进行了改组，一批中共地下党员涌进了学校担任行政和教学工作。从此，校园开始活跃起来了。

1939年上期，是学校最活跃的一期。在党支部领导下，"工学团"（学生自治组织）、"学级联合会"、课外活动小组、宣传队等组织相继建立；马列著作，进步的书刊、报纸也进入了学校各班，师生们的思想觉悟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当时，我是"工学团"团长，带领着宣传队走出校门，到附近一些村镇开展抗日的宣传活动。同学们在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学校党支部经请示地下县委批准，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担任了团支部书记。

暑假，郭力军老师（当时任班主任、县委宣传部长，解放后任北京等军事院校政治部主任，已故）主持开办拉丁文和党的理论知识积极分子训练班，师生有四十多人参加学习。结束后，学校党支部就在训练班的部分师生中发展了第一批党员。我经郭力军、何大群（解放后任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已离休）两老师介绍，由共青团转为正式党员了。

我们的入党宣誓大会是在学校厨房后面的一个大岩洞里进行的。这岩洞，又深又大，还有小河。里面小道弯弯曲曲，黑洞洞的，要打着火把才能进洞去。可是，我们经常在洞里摸鱼，开会，非常熟悉它，不用火把也不会迷失方向。宣誓的那天晚上，省工委负责人周里同志也赶到，他和我们亲切地谈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何大昶同志（当时任东屏区委）领我们唱国际歌；何大群老师向我们讲解了国内外形势。宣誓时，由当时县委组织部长何子钧（后叛变）监誓，十多个同志举起手，宣读着事先在黑板上写好的誓词。宣誓完毕，大家举手表决，选举了何大群同志担任支部书记，我为组织委员。从此以后，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上党课，过组织生活，我们都在清风岩洞里。它，的确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场地。

1985年，郭力军同志病逝，何大群同志写诗悼念他。还提到了清风岩。诗云："旧地重游梦未成，清风岩里风犹清。何时泪洒南天雨，北望京华悼故人。"

二、启明罢课始末

这年下学期快开学的一个夜晚，国民党反动派一个连的武装军警和特务分子，突然把学校包围起来了。

我们宣传队四十多个同学，暑假中一直留学校．在附近村镇公演《兄妹开荒》、《棠棣之花》。演出回来，都已经睡下。军警们把我们一个个从梦中叫醒，一个为首的对我们说："你们是学生，要认真读书。关于老师的问题，你们都不要介入，更不要受异党的煽动……"说完，他们当即把郭力军等老师都带到县政府拘禁起来。横加的罪名是：鼓吹拉丁化，非法进行异党的宣传。

开学了。同学们都到了学校，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顿时群情激愤。在上级党和支部领导下，成立了以我为首的"护校委员会"。我召集全体师生和部分家长集会研究了对策：首先，宣布全校罢课。一场汹涌澎湃的学潮掀起了。

每天，我们都派出几十名代表到县政府、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教育局请愿、示威，要求无条件地立即释放被拘禁的老师回校上课。我们还与县长奚泽，书记长郑德行、教育局局长周声振和省教育厅派来的督学段廷规等面对面地进行谈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

在谈判期间的一天，奚泽带一班人马来"视察"学校、"参观"清风岩，其实是来搜查"罪证"和了解学校党团活动情况的，我们早有戒备。他们和师生在交谈中，抓不住我们有什么"越轨"的行为。于是，奚泽要我们点燃火把，到清风岩洞里去看看。事先，我对打火把的同学有吩咐。我们领着奚泽一班人下到洞里，洞里连柴灰、纸片都已敛迹。进入

洞深部一个转角处，打火把的同学故意跌倒，将火把扑灭。他们一时乱了阵子，好一段时间才从洞里踉踉跄跄地爬上来，弄得他们一个个狼狈不堪。奚泽这回没有捞到一点什么，一出洞就大发脾气，破口大骂："这班学生，太不成体统了。"

有一次，我们在县教育局的楼上，与那些官爷们进行了长达九小时的激烈论战。开始，他们装出一幅伪善的面孔，让我们坐下，喝茶，问长问短，表现得象十分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似的。我听了他们的花言巧语，想着他们无理拘禁教师，迫害共产党人的可耻行径，更加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他们是企图拉拢、分化、瓦解我们学生，我们决不能上当。我立即义正严词地驳斥了他们种种诬篾，我们的党团骨干也一个接一个地指责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利抗战，不利教育，不利团结。应当立即释放教师复课。段廷规眼看软办法收买不了我们，他收敛了刚才那副伪善的面孔，把桌子一拍，凶相毕露。他威胁着厉声说："你们如果执迷不悟，咎由自取，后果不堪设想！"老奸巨滑的周声振在一旁插话："你们这班学生也太不受抬举了。老督学这样谆谆教导你们，你们怎么不听话？"我说："听话？听什么话？狗嘴里能吐出象牙吗？"周声振当下脸一沉，气冲牛斗。"岂有此理！简直太无法无天了。"他拿出一张白纸，"好吧，你们都写上名字。不听从劝告，不承认错误，就不准回去！"我们听了哈哈大笑。要求释放老师回校上课，有什么错误？和他们讲理，又犯了什么罪？彼此怒目相视片刻，同学们向他们的斗争走向了高潮。我们唱歌、跳舞，大叫大闹。不准我们回去，我们吵着要饭吃。一时闹得整个县政府大院不得安

宁。他们无可奈何了，不得不放我们回校。这场斗争已初步取得了胜利。

斗争在继续着。一周以后，县委通知我、何金生、何学孔三人去研究与官方谈判事项和达成协议的内容，征求了我们的意见。县委负责人何大仁并向我们透露了一些消息。之后，谈判开始了。地点在县里一位开明人士的公馆里。学校代表有我、熊永顺、何作霖、何作表等十几个同学。与官方磨了一阵口舌，他们最后还是答应释放被无理拘禁的郭力军等老师，但要解雇他们；还要改组学校领导，由何德滋（开明人士）担任董事长兼校长，并聘请无党派的大学毕业生几人来顶替被解雇的老师。这个协议，开始我还不同意。后来，县委同志向我详细说明了当时的形势和学校新来老师的情况，我又回校与其他支委、骨干分子共同研讨，为了顾全大局，大家同意了这个协议。至此，罢课斗争暂告一段落。

斗争还有余波。在这场斗争过程中，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增强了我们的识别能力。我们发现教师何曾修（前教务主任）是国民党的特务。他隐藏在学校，经常把我们活动的情况向国民党党部汇报，使进步教师遭到迫害，党的工作受到破坏，大家实在不可容忍。我以“护校委员会”和“工学团”的名义召开全校大会，揭露了他的阴谋破坏活动，激起了公愤。大家一致要求把他驱逐出校。会后，有的同学自发地写警告、画漫画贴在他房门上。还有个同学在学校附近的一块石碑上写着：“打倒张伯伦式卖身求荣的何曾修”，过路的人看着这标语，更加唾骂他。

何曾修在众怒之下，企图推脱罪责，老是低着头来找我和何大群，想作一番解释。我们专门为这事召集党团员联席

会议，讨论如何对他处理的问题。会上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以骆人杰（后叛变、被镇压）何学孔（后叛变、外逃）为一边的少数人主张对何曾修让步；以我为一边的大多数人，则主张在彻底揭露的基础上，还要给予适当的打击。在这两种意见各执一端的情况下，我只好请示支部和区委负责人进行裁夺。结果大家根据当时党的“依靠进步势力、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采取了既揭发他的勾当，又让他留用的折衷办法。这场罢课后的余波才得到了平静。

县委对被解雇的老师也作了妥善的安排。为了让他们安全离开汝城，我组织了部分党员同学先后分两路护送他们夜行出境。一路送到广东边界，一路送到江西边界，行程都是五、六十里。这场历时一个多月的斗争，表现了我们当时对革命信心百倍，对同志满腔热忱，对敌人深恶痛绝。学校的革命队伍也随着更加坚强和壮大。在年底我毕业离校时，全校已发展党员三批，共四十多人。革命的火种撒到了全县各个村镇，在燃烧，在冒着熊熊烈焰……

三、惜别家乡热水

1940年上期，我从衡阳休学回乡，在热水乡鱼王村文明小学任校长，以教育工作为掩护，在家乡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和我一起从启明中学毕业回乡的党员同学，就有七、八人。我们分别成立了热水、鱼王两个支部，由我和何金生分别担任支部书记。因为我们的归来，这个边远沉寂的山区也变得活跃起来了。

热水乡有文明、高滩、热水、南木垅、桃金洞、小水等小学，任教的老师们与我的关系非常亲密；又由于我主持的

文明小学校较出色，当地乡保长、士绅和群众对我很信任。这些，为我开展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我们大办“读书会”，打开工作局面。“读书会”，原在启明中学时就搞起来了。那时候，同学们自己凑钱，进城到星光书店（地下党开办）购回三百多本进步书刊，还有各种报纸，办起了“读书会”。毕业了，我们把这些书刊、报纸，连同在启明“读书会”的那套宣传办法也一起搬过来了。

我们把这批读物分发到六个点上巡回流动借阅，广大的读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因势利导，发展“读书会”会员，条件很简单，写份申请，交一元会金。会员由原来的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有教员、青少年学生，还有士绅、乡保长等。他们交的会金，我们全部拿来增购图书，加上原有的，一共有上千本。当时最积极的会员、勤奋的读者有曾梓材、熊永顺、刘振才等，他们读了这些进步书刊，深受启迪，寻求真理，坚决走革命的道路。“读书会”的活动的确影响很大。

这年下期，我受聘担任乡的中心学校教导主任。校长是乡长曹广渊挂名兼的，学校工作实际由我主持。我深入师生群众中，听取意见，发扬民主，改进领导作风和教学方法，广泛开展各种课外小组活动。如成立读书小组，阅读进步书报；成立抗日宣传队，到圩场巡迴演出。每逢星期一，我向全校师生作形势报告，学校的政治、学习空气十分浓厚。

我和乡、村负责人的关系相处很好。每逢群众大会或保甲长会议，都邀我去讲讲形势。借此机会，我努力宣传党的“坚持抗日救国，反对卖国投降”的主张。假日，走访学生

家长，联系老同学，和他们谈时事，清除一些人对我党的误解。以上这些工作，赢得了广大群众对我的好感。

这个学期，党团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学校已建团，有几十个共青团员。他们的工作十分活跃，是党的有力助手。这时全乡党员已有二十多人，是一支战斗性很强的队伍。热水乡的工作成绩显著，党团员起了巨大的作用。县委领导何大昶、何大仁、朱家基等同志，曾多次来这里听取汇报，总结并推广了热水乡搞“读书会”广泛联系群众、抗日宣传活动三点工作经验。

正当我们的工作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和钟昌武同志接到了县委的通知，要我们到离城五里外五里庙的一座偏僻的山上去，秘密会见一位领导同志。约定的暗号是：见面时他挽起左袖，我解开衣扣。我如约去会见了他。他是谁？是一位长征干部、延安派来的特委，名叫赖绍尧（现为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汝城县是他的老家。他回得家乡来，穿一身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制服，挂着少将的肩章，名声赫赫，哪敢惹他？谁也难料想他竟是一个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人。我们一见面谈话，他就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并指示我，今后，不要停留在宣传工作上，要设法夺取乡公所的枪枝，搞武装斗争，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他的话对我很有启示，我把这个指示精神认真而具体地向党支部同志作了传达，并和大家一起研究了开展武装斗争的一些谋策。可是，不到半年，赖绍尧同志又一次地紧急通知我，在土桥何作崖同志家里会见。我们同在那里一宿，谈话的内容很多。主要是：平江惨案的发生，给了我们莫大的教训。要百倍提高警惕，注意隐蔽……。

不久，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也笼罩

到这偏僻的山乡。那些大地主、大恶霸、国民党党棍，趁机散布流言蜚语，用屠刀砍向我来。曾广渊在这恶势力的胁迫下，不得不把范行瑞（原云头小学教务主任）调来担专职校长。范一上任，首先解除了我教导主任的职务，把我降为班主任。接着，采取了一连串的反革命措施：禁止共青团活动，取消学生会，查封进步书报……谁与我接近，都要受到训斥或警告。他还说："异党的活动不断深入到了学校，也打进乡公所来了……"

这时，骆人杰投敌叛变，一下子暴露了他这个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本来的面目。他借故不参加定期的组织生活，拒交党费，与我们疏远。他还接受三青团的命令，到长沙受训。受训回来，担任了三青团热水乡的区队长，积极发展反革命势力（后当上乡长，出卖党组织，罪恶累累，解放后已镇压）。再加上县委组织部长何子钧叛变，反动势力更加嚣张险恶。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正在这紧急关头，刘俊才向我传达了县委的指示，要我立即转移，到广东始兴师范学习……当晚，我惜别家乡热水，在钟昌武、陆宏富等几位亲密的同志护送下，到达了广东边境。

四、始兴师范一年

1942年上期，我离开家乡热水，来到广东始兴师范学校共学习了一年。这时期，何康民担任始兴县县长。他是汝城人，思想较开明，属国民党左派。他分别安排了范大光任民进科长，何大群任督学，欧阳俊任师范学校教师。学校的教务主任刘彦邦、教师梁炎木、容民锋都是地下党员。我们从

启明中学一道来的同学有五个党员，广东籍的同学中也有一些党员。我们建立了支部，欧阳俊担任书记。党员中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不论是广东籍还是湖南籍，大家团结一起，开展各项政治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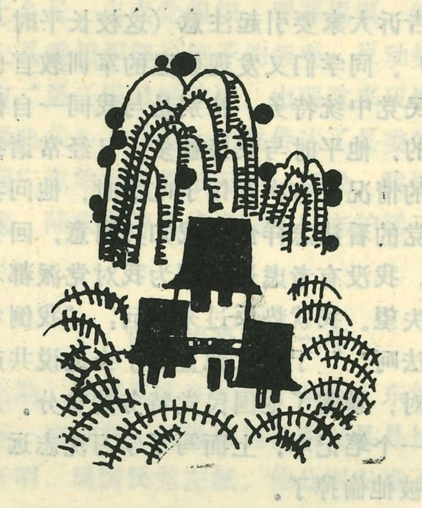
我们出刊油印快报（党的地下刊物）、墙报、黑板报，经常举行时事座谈会、专题报告会、联欢会、野营会、文艺晚会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和统一战线的政策，纠正了一些人对党的偏见。在这些工作中，增强了同志间的战斗友谊，激发了全体师生的爱国热情。大家互通情报，警惕敌特的暗害。

学校图书管理员朱尚炯同志，看到了外来的一封绝密信，知道了要校长搜集有关中共始兴县委在学校活动情况的消息，及时告诉大家要引起注意（这校长平时与国民党县党部往来密切）。同学们又发现姓温的军训教官也和校长一样，都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特别是与我同一自修室的一个同学叫沈振华的，他平时与我接触多，又经常请我上馆子，企图刺探我们的情况。有次在馆子吃饭时，他问我："阿钟，你对国共两党的看法怎样？"我知其用意，回答说："你提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虑过，因为我对党派都不感兴趣。"他听了感到失望。我就势反过来探问："我倒希望听听你对这方面的看法呵！"于是，他直截了当地说共产党这也不是，那也不对，暴露了他国民党特务的身分。后来有一次，我抽屉里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写了学习沈志远《大众哲学》的心得，也被他偷掉了。

这时，何康民把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限制和取缔异党活动的指示私下告诉了范大光，我也把从沈振华谈话中得知国民

党要对我党地下组织采取行动的信息，向欧阳俊作了汇报。于是，我们全体党员集合，在郊外一个偏僻的地方，召开了最后一个支部会。全体决议：提前转移！

转移前，广东籍的党员同志们引我到一个茶馆里，秘密会见了地下党县委书记陈培新同志（当时任民教馆长）。他热情地对我说："你们决定及时转移，作得很对。没有暴露身份的可回汝城；至于你，可和几位老师一同到广西那边去。这样作，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后会有期，祝同志们一路平安！"有十几个广东籍的同志，护送我们几十里山路。分别时，互相勉励："我们要继续战斗，直到最后胜利！"



回忆父亲饶省三

区政协委员 **饶肇宇**

家父饶公省三，生于一八九五年古历八月二十五日。幼年祖父送他入某钱铺学徒。旧社会学徒，不啻奴仆。进师头一年，老板吃饭时，要侍立桌旁接碗添饭，饭毕恭侍洗漱，然后方可到厨房吃点残菜剩饭。老板有小儿上学，每日命家父背着接送。家父秉性高傲，耻为下役，背着少爷去上校，往返在离店稍远处即使其下来自走。一日天雨，老板娘发现小儿鞋湿，追问情由，因痛笞家父以致头破血流。家父回家哭诉，祖母说："徒弟徒弟，三年奴隶"，劝其忍辱学艺。家父实不愿受贱役之辱，因自投当时名画师文海渔先生门下学画，且发奋攻读诗书。不几年，绘画与书法大有长进。长沙湘绣业争相聘请绘图。家父所设计绘制的"百子图"、"潇湘八景"以及狮虎走兽等绣品，曾远销欧美，颇为海内外人士欣赏。从此一生以绘画为业，且常为各报刊写稿，以写戏评、杂文、谐赋为其所长。时国民党要人如鲁涤平、贺耀祖等慕家父名，托人致意，欲聘为秘书。家父为人耿介，不喜逢迎，更厌恶旧官场习气。曾自书一联于门首云："卖画鬻书只求一碗饭果腹，淡泊明志不为五斗米折腰"。又自画一老汉背着儿子行走于途，题句云："愿与子孙作牛马，

不求闻达于猪猴”。故将“诸侯”二字写成“猪猴”。以此联此画表示拒绝官场聘用。此画讽刺辛辣，来访布衣之士，莫不拍手称快。

家父在旧社会几十年，乐于自由职业，无党无派，不参加任何社会组织，唯嗜湘剧成癖。民国十四年左右，曾与田汉同志在马王街修业学校内研究创办《长沙戏剧报》，以评论戏剧为主要内容，不仅对各名角演艺加以评价，更着重于剧本的评论，尤对历史剧的时代背景，人物性格以及对今人的教育作用，辟专栏多有评述。惜田汉同志在长沙停留不久，戏报未及一年即停刊。此后，家父常在长沙各民办报刊发表戏曲评论文章，深得读者赞赏，尤为艺人所欢迎。因此，一些湘剧名演员如吴绍芝、黄元和、徐绍清、贺华元等常常登门请教。家父与他们共商唱词的精当，对剧情处理亦多提出修改意见。畅谈终日，毫无倦容。曾来长演出的京剧名演员如梅兰芳、尚小云、马连良等也曾与家父聚会，研究戏剧的改革。

抗战时期，长沙沦陷，家父携家室逃亡于兰田、安化、溆浦、沅陵一带，在安化、沅陵主办画展，得资维持生活。在流亡生活中，曾撰写《湘剧史》，初稿约十万字。其较重要的目录有：湘剧的起源、湘剧的科班、湘剧各名演员小传、湘剧唱腔曲牌种种、湘剧脸谱研究，长沙历年湘剧院之兴衰以及附录湘剧改革的专论等等。此著家父多方研究考证，数易其稿，惜文化大革命时期随同所集诗文自毁于火，实在可惜之至！

家父一生贫寒，乡无寸土，城无片瓦，唯好藏书。所赚画资，用于购书不少。除文史古典外，有不少名贵画谱，则

皆毁于长沙文夕大火。家父曾不胜惋惜地对我们兄弟说：“穷不卖书留子读，而今这点财产也不能传给你们了，你们还是要多读点书为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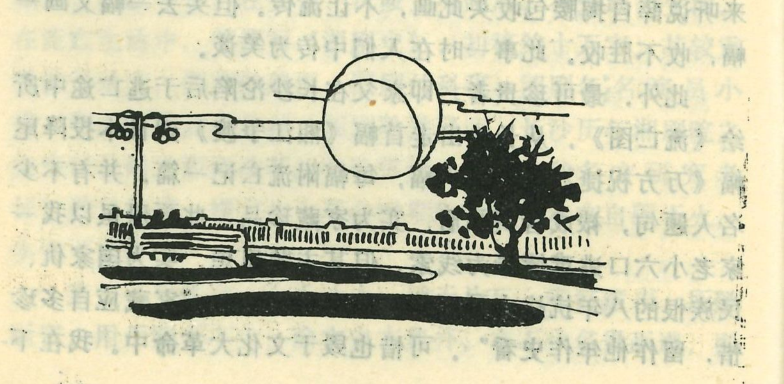
家父虽有旧文人习气，自命清高，不问政治；但在抗战时期，却画有不少揭露日本侵华罪恶的画稿。如所画反映日军进攻长沙时的《人民风雪渡江图》，取景于长沙湘江。风雪弥漫，波涛汹涌，市民拥挤于沿河东岸，争相抢渡。画中人物扶老携幼者有之，相抱痛哭者有之；河中人满船翻的惨景，水面飘流的箱物，俱属写实。它既控诉了日帝侵华战争带给长沙市民的悲惨遭遇，也揭露了国民党军弃城逃走置老百姓死活于不顾的腐败无能。这幅深寓国恨家仇的画，当时争购者不少。原稿一再复制不下数十幅，影响甚大。当时为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所忌恨，曾派人上门加以指责，禁止再绘。家父对此，不畏权势，乃投稿于长沙某小报，以激愤之情写了一篇意在抗议官府干涉的讽刺杂文，表示要以几支秃笔，继续绘出这类富有历史意义的画稿出卖。后薛岳对此，可能对舆论有所顾虑，终未加如何。不过，后来听说薛自掏腰包收买此画，不让流传。但买去一幅又画一幅，收不胜收。此事一时在人们中传为笑谈。

此外，最可珍贵者，即家父在长沙沦陷后于逃亡途中所绘《流亡图》，从长沙出走首幅《湘江争渡》到日本投降尾幅《万方祝捷》共二十六幅，每幅附流亡记一篇，并有不少名人题句，裱成合页画册，实为家藏珍品。此画册虽以我一家老小六口逃难情景为线索，但其主题思想，实为国家仇、民族恨的八年抗战史画。曾记有人题句云：“家藏应自多珍惜，留作他年作史看”。可惜也毁于文化大革命中。我在下

放汝城时，一夜曾梦父亲向我谈及此深为遗憾之事，依稀叮嘱我仿其意再画以留念。醒后，曾写《梦中哭父》七律一首："寒香馆主爱诗书，笔墨生涯七十余，泪写流亡情尚在，魂归叮嘱痛何如。伤心焚画家藏失，在耳遗言梦醒初，明日清明遥祭奠，披衣起视晓星疏"。诗虽不工，然确为挥泪之作，（注："寒香馆主"为家父笔名之一）。

一九六四年，前长沙市文化局局长戴伯淳同志曾请家父参加挖掘、整理湘剧传统剧目，家父另写有《林黛玉之死》剧本，在湘华剧院上演四十余场。文化革命时，戴伯淳同志受到批判，街头流传的大字报，曾涉及此事，并点了家父名，家父终日惶惶，唯恐大祸临头，因而在恐怖、忧虑中突发心脏病死去。时为一九六八年古历正月初二日。

我在学习古典文学中得家父教益非浅，也从父学绘画多年。惜自不成才，无所成就。家父工诗画，有专长，惜有为之年皆在旧社会度过，及至解放后已年老力衰了。苟能晚生三四十年，在新社会多些岁月，则其造诣和艺术成就必将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鼓励，也一定对人民有所贡献。



两岸深情 一心爱国

——忆双亲周可均 古谷清子

区政协常委 **周静思**

家父周可均（1880—1960），号极寰，清末时期（1901—1909）公费留学日本，为明治大学商学院高材生。他抱有实业救国大志，爱国赤忱炽热，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

家母古谷清子（1893—1955），祖籍日本。她出生地大岛町，为东京旅游胜地。那里风景宜人，生活富裕；人们和睦相处，淳朴成风，有"世外南国"的美称。母亲自幼生活在此，文静贤淑，品德高尚。外祖只她一女，钟爱非常。母亲年青时曾在帝国医院学护理，是一位技术精湛的产科护士。后经朋友介绍，与留学在日的父亲结织。

一九一〇年，父亲重病住院，急需输血，母亲毅然献血相救。此事促成了他俩的结合。

按日本习惯，独生女只能入赘。但父亲早有回国振兴实业的雄心壮志，并不为儿女私情抛弃祖国，入籍异国。为了顺应外祖意愿，父亲权且应允子女入日籍，随外祖姓。并特意将我留在外祖身边，以慰其年老寂寞。父母二人，则渡海回国。以后，隔几年去日本一次，看望外祖和我们。

父亲回国后，按照自己的夙愿，在上海经营工商业。当时，有许多日本巨商也在那儿开设公司，如古河公司、大公纱厂等。他们都曾企图利用父亲的经济才华及爱人是日本人的关系，多次许以重利，委以买办经理之职，收买效劳。但父亲基于高度的民族自尊感和爱国热忱，毅然拒绝了这些利诱。坚决地跟随当时湖南商界的巨子聂云台先生，为经营实业、振兴民族经济四处奔走。他矢志不当买办，不投靠外人。

民国初期，父亲一度任过湖南财政司次长（相当于厅的处长）。民国十年前后，任过上海、汉口等地的湖南银行行长。谭延闿督湘期间，曾锐意振兴湖南的实业。采矿业中有名望的邓礼吾、凌霞新等几位先生，都为开矿事与父亲常有经济来往。后来回湘参加筹组湖南华实纺纱公司，黄早奇任董事长，父亲任董事兼财会。他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开始了湖南省的纺织工业。此后该公司改为官办，先后更名为湖南第一纺纱厂、裕湘纱厂。由于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实力强大，民族资本家想振兴中国实业只是一种幻想，所以，湖南成立第一纺纱厂后，再无力成立第二个纺纱厂了。父亲的夙愿也就难以实现。

三十年代初，父亲为了改善长沙人民的生活用煤，曾独资经营益群藕煤公司，把日本改善用煤而行之有效的“文化炭”（即藕煤），在长沙生产推销。该公司生产使用日式机械，生产的藕煤已销行于部分医院和邮局。虽然藕煤质量良好，又价格低廉。但由于社会的守旧习惯，推行不广，以致不能大力开展生产。

一九三六年，中日两国关系极度紧张，我因在校受到同学

歧视甚至恶意辱骂，心情痛苦；外祖为我终日忧愁，便写信给父母，说我非常想回中国。父母在回信中给我许多安慰，并叫我即刻回国。我回国后，父母亲温暖我受创伤的心灵，并鼓励我学有专长，奋发图强，振兴中华，才不会受到异国欺凌。我正喜回到祖国，能在双亲身边安稳生活的时候，不料日本侵华战争，迅速拉开序幕，全家陷入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之中。

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有的国民党大员，为发国难财而积极寻找门路。我们一家，也成为特务机关极为注目的对象。

这年秋天，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仅凭着我母亲是日本人，子女多为日本籍并居住海外，而我又恰是在抗战前回国等情况，竟以莫须有的“汉奸嫌疑”罪，将我们全家拘捕。还明目张胆地要勒索两千元大洋，才能私了，并美其名曰“救国捐献”。父亲认为：既是捐献，事前不作动员，而在拘捕时要“捐献”，此与歹徒“绑票”无异。如果是要钱赎罪，我既无罪，自无庸赎，他决心不予理睬。这便是父亲被关在狱中长达六年之久的原由。其后，省党部还指使特务趁机纵火，将父亲苦心经营的藕煤公司的厂房及设备、私人住宅焚烧一空。

一年后，我和母亲提前出狱，因无家可归，于河西农村寄居。生活贫困，负担沉重，苦衷难言。

一九四四年，长沙沦陷。刚出狱不久的父亲又不得不和母亲到长沙北乡史家坡一带避难。当地日军经常残害老百姓，母亲就利用乡亲关系，多方交涉援救。周围数十里出了事，前来求救的络绎不绝。当地日军都知道这位爱行好的同乡老太古谷氏。在此同时，日本驻军也曾要父亲出任伪职，都被父亲拒绝。

抗战快结束时，父亲又因陋就简，重振益群藕煤公司。刚有起色，内战继起，此事只得再次搁浅。

解放后，父亲所经营的益群藕煤公司被陆景市长尝识，认为有推广价值，于一九五一年由市接办。从此，我市生活用煤逐渐普遍采用藕煤，“益群”也真正做到了有益于广大群众。

父亲还参加了民革组织，经常与曹伯闻、黄一鸥、张正卿等一些朋友来往。他们在一起叙旧话新，感慨万端，热情赞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有，父亲曾与林伯渠同志在日本同学，林老曾致函长沙市政府，嘱对父亲多加关照。市府派人前来探望，父亲对来的同志说：“我年老昏聩，不能为人民效劳，已是不安；国家正百废待兴，非财莫举，我怎能无功受禄，增添人民负担？我有子女赡养，生活温饱，请政府不要为我晚年生活担忧。”他就这样婉谢了林老的关怀、老学友的好意。

一九五三年，在新中国生活了几年的母亲，看到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一反国民党统治者所为，很合她的心意。她主动提出要加入中国国籍。并且在大病初愈，步履艰难的情况下，亲自前往户政机关，办理了入籍手续。她鞭策自己，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不幸的是，在她入籍后的第二年即病逝；一九六〇年，八秩高龄的父亲也因病与世长辞，他们都未能看到今天中日友好往来的盛况和祖国前所未有的安定团结的新局面。

双亲与我永诀了。他们生前一贯热爱祖国，支持正义，憎恨邪恶，反对侵略与促进和平事业，为我作出了较好的榜样；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永远激励着我为祖国四化建设事业而忘我奋斗。

“音专”脱险以后

省农科院 朱芳

一道“护身符” 吓退喽罗兵

我和明超撤出“音专”（湖南省音乐专科学校），动身到临澧七重堰去。陈采夫（国民党水陆交通少将指挥官，党的统战对象）特意派一名护兵跟随我们，负责沿途的安全。

我们登上轮船，从旅客手中看到了当天的报纸。那上面登载了我们失踪的消息和学校当局在四方塘青年会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情况，心情十分激动。傍晚时分，轮船到达津市。如上岸住旅馆，怕查房时出危险，就决定在船上过夜。谁知这时候水上警察上船盘问我们了。他们带着怀疑的眼光打量我们，问哪里来，哪里去，干什么的，还要检查证件。这时，我不慌不忙从手皮包里取出一封早就准备好的信件，这信是采夫写给临澧县伪警察局长侯方宇（民促社成员）的，大意是：我们两兄妹（行前，党组织决定我们化名并以兄妹相称）是国民党某要人的亲戚，这次来临澧串亲，请多加关照云云。想不到这封信竟起了神奇的作用。当这些愚蠢的水警见是陈采夫的亲笔手书，信又是写给局长的，且我们穿戴不凡，并有护兵随行，便毕恭毕敬地把信退还，致礼告退。

敌酋亲出马 什么捞不着

我们到达太浮山区后（太浮山位于常德地区石门、临澧、桃源、慈利交界处，距常德约一百华里），明超便到游击队里去了。我留在保宁桥澧阳小学教书，以教师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开展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为游击队收集情报和建立党的地下联络站。这阶段，什么累呀，苦呀，困难呀，危险呀，全然不怕。一心扑在工作上，只盼早点解放。由于我们活动频繁，党的威望迅速提高，群众奔走相告："太浮山来了两个姓朱的共产党员，是从北方派来的。"这样，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他们从石门、临澧派来一批批特务到太浮山保宁桥一线刺探情况，敌暂编一师师长田载龙还亲自跑到保宁桥来窥探。有天上午，我刚刚下课，正好明超也从太浮山下来，我们正在交谈，突然，澧阳小学校长易华（民促社成员、党的积极分子）气喘呼呼地闯进房来，"不好了。芳老师，田载龙带了几十个枪兵从白洋湖到保宁桥这边来了。"我们听罢，分析了当时的敌情，估计不会有什么大的举动，便请易华照样上课，让敌人来了什么也抓不着。于是，我们便从容地走出后门上了澧阳山，一直到天黑才回来。由于我们和群众的关系较好，虽然田载龙闯进来了，却能化险为夷，使敌酋空手而归。

一帷隔两地　彼此各安家

一九四九年五月，陈采夫调到他的老家澧县，任伪湖南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这是中共省工委从湖南和平解放的战略全局考虑，通过程潜的关系而安排的，他受湘西地工委直接领导；同时，我们也接到通知，去澧县城里与湘西地工委书记方用同志接上了头。

我在县城小西门采夫的侄儿（伪镇长）家住下，不久又搬到一位大士绅家中，刻印党的秘密文件。那时澧县城里很乱，到处驻扎了军队。有一天，我正在刻写文件，听到外面吵吵嚷嚷的，连忙将腊纸、钢板收藏起来，正待出门观看。忽然十几个国民党士兵闯进房来，说这家房屋宽敞漂亮，要把军部电台设在这里。一个当官的指挥着士兵们把器材直往我房里搬。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我意识到绝对不可示弱，义正词严地说："干什么？你们是哪部分的？"敌人慑于我的气派，搞不清我的来头，只好向我小姐长小姐短地好言解释。说是找了好久，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安置电台，想借我住房一半给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我若坚持不同意。怕事情弄僵了，那藏在房间里的腊纸、钢板、油印报和党的文件就马上有暴露的危险，倒不如将计就计。谈判的结果是：房间让一半给他们作电台，但必须用东西隔严实；更不许他们到我这边来。就这样，一间房分成两半，中间用军用帆布隔开。房这边是我住室——共产党油印秘密文件的地方；房那边是他们的电台——国民党的机要重地。一帷之隔，两个战场。敌人不知道我，我却把他们看得清清楚楚。真正应了一句古话："运筹帷幄之中，决战千里之外"。只要我胆大心细，在敌人鼻子底下工作，反而安全保险。而且，只要留意观察分析，情报不偵自来。这种富有戏剧性紧张而又严肃的工作，更加吸引了我与敌斗争的兴趣。我坚持下去，愉快而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后来，这事被采夫知道了。为防万一，他立即派人把我接出来。当时，我象一位阔小姐，坐上华丽的大轿。前呼后拥，招摇过市，体体面面地把我抬出了澧县城门。

抗日烽火下的一簇奇花（下）

——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纪实

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在中共湖南省工委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整两年。其间，流动湘、桂两省，推动儿童运动，开展多种宣传活动，号呼奔走，不辞辛苦，是国统区内几个组织最大、时间最长、工作最活跃的儿童团体之一。她的的确确是抗日烽火下的一簇奇花。

戈　明

1985.12.29

推行抗战救国纲领，动员全民抵御外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重要的方针政策。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参加抗战，这是敌人逼出来的。全国著名的"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在战斗，湖南的孩子们也继而奋起。

"母体"里诞生在育英学校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长沙东乡团头河石桥村的私立育英小学校长孙伟，代表师生意愿，请示中共省工委同意，决定筹组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以下简称育英儿童团）。周恩来同志以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名义，批示第九战区政治

部，准予我团办理备案手续，梁寒操主任签发了抗日救亡民众团体登记证书。同时，我团领取了厅长郭沫若、处长田汉盖有签章的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护照。中共省工委直接领导下的育英儿童团已经正式备案，在国统区内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喜讯传来，学校师生情绪昂扬，歌声、锣鼓声响彻云霄。大家抓紧学歌、练舞、排剧，制作布景、道具和化装油彩；教师黄俊连夜创作团歌、进行曲。都争作各项准备工作，渴望入团贡献力量。

省工委指定的全团总顾问孙伟，先在团内建立党支部，担任书记。根据当时学校需要继续教学和团的经费有限等具体情况，党支部决定团的组成人员：教师中，有黄俊、李任练、黄力佛、赵楚石四位担任顾问；学生中，遴选邓寿观（女）、李建坤、罗孝荣、孙阜民、康明超、李国坤、孙叔秋、游汉鹏、陈元凯、李如一、杨开云（女）、李长福、张若曦、李竟仁、张业褒、黄正寰、黄开寰等二十人为团员，年龄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十一岁，大多十二、三岁。

十二月二十五日，一支以孩子们为主体的抗日救亡队伍——育英儿童团宣告正式成立了。

那天，孙家祠堂前坪，热火朝天。全团严肃、激昂地高唱团歌：

飞机、大炮，逼得我们不得安宁。
炸弹、毒气，威胁我们不能生存。
我们不能坐着等死，我们不能逃走偷生。
我们要为民族解放而努力，为世界和平而斗争！
一面工作，一面奔跑，

把日寇的凶残，向大众报告，使大众明瞭。
还有锄奸、除暴，军人招待，民众响导，
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做到。
从工作中学习，在工作中创造，
自我批判，集体领导，
是我们的主张，我们要做到。
我们年纪虽小，抗日救国不辞劳。
接着，又唱了团的进行曲：
枪在哀鸣，炮在怒吼，法西斯野兽正在咆哮。
夺我国土，杀我同胞，还说它在宣扬王道。
我们不能坐等也不逃，
我们要来揭露日寇的残暴，我们要把汉奸谣言扫。
我们一面学习一面教，不论什么大家来探讨……

大会上，顾问孙伟宣布全团成员名单。大家总结了学校实行抗战教育的经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当时，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给了我们很大影响。我们强调要集体生活，集体领导，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一切事情尽可能自己干，顾问只起辅导作用。我们制订了团章（与本文上编所述育英学校拟定《我们抗战教育的主张》义同）；通过了公约（内容大意是，全团必须遵守：团结友爱，服从集体，努力工作、学习，爱整洁，热情为群众服务等）；确定了组织形式：团员大会权力最大。设干事会，有主任、总务、宣传、学习、社会服务五个干事。干事会下设文书、庶务、卫生、通讯、出版、漫画、歌咏、图书、难民救济九个股，职务都由团员担任。前期选举李建坤为主任干事，罗孝荣、孙阜民、邓寿观、钱中森任干事。

还定出了街头讲演、出刊壁报、漫画与图片展览、社会调查、流动图书、演出慰问等工作项目。

徐特立同志很关心育英儿童团，他曾多次对孙伟说，不要以为育英儿童团备了案就什么事没有了。国民党对你们是注意的。他们会采取各种办法阻挠你们的工作，必须提高警惕。在策略上要搞好统战关系，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争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省委负责人也作了类似的指示。

建团初期，学校拿出一百元作开办经费。第九战区政治部，固定每月发给我团五十元作生活补助费。顾问、团员只有饭吃，零用钱都要自备。经费有困难，可向社会捐助。邓克生同志祝贺我团诞生，捐赠了大批白报纸。他第一个伸出了援助的手，给我们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初战在湘潭

建团后，我们沿着浏阳河畔的团头河、柏加山、镇头市、五美山、嵩山寺等集镇宣传演出。一九三九年一月中旬的一个晴朗的下午，大家轻装紧扎，开始远征，先步行向湘潭进发。一路上，大团员争着挑箱抬笼，搬运图书、漫画、道具等公物。

到湘潭县城，我们住进昭潭小学（今湘潭师专附小）后，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工作。每天必学时事。年纪大的，要学习艾思奇著的通俗哲学。每人还发有曹伯韩著《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一本，自学后讨论。在一次讨论"从猿到人"的时候，掀起了一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有趣的辩论。

来湘潭不久，便是旧年除夕。全团围着一大蒸钵四角钱

肉熬的汤，还有一脸盆大白菜，吃得津津有味。一位顾问心思伙食不好，怕孩子们想家，便逗趣地说："湘潭的白菜，比长沙槊梨的萝卜还好吃。"有个团员顺口接着说："湘潭的白菜，比猪肉还好吃。"他们的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饭后，围坐在大球台旁边，一边嚼着湘潭有名的结蚕豆，一边开娱乐晚会。全团欢聚一起，真胜过往年各自在家团年的天伦之乐。

春节一过，雨湖堤岸上的柳树吐出新绿，我们的工作更加活跃。在县城最繁华的总上及文庙前的学坪（今湘潭师专）和豫章小学的球坪（今师专体育场）一带，多次作了街头讲演、演出、画展和开放流动图书等活动；每周出刊大幅壁报"大家看"；在墙上刷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等内容的大标语。我们还同军委会政治部宣传站湘潭基站、新中国剧团等抗日团体一起，组织各界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会，参加了三月六、七日两天的募捐公演。湘潭城充溢着浓郁的春的讯息。

斗争是复杂的。事实印证了徐老的预见。在我们从长沙出发时，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就密令国民党县以上党政机关，称育英儿童团为"共产党外围组织，应予严加防范。"又，当时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明明当了汉奸，亲日反共份子却说他是"曲线救国"。因此，我们演出的《打杀汉奸》、《认贼作父的汪精卫》、《汪精卫的自白》等节目，只演出一次，即被当局禁止再演。我们刷写在墙上的"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等大标语，当晚就被人用石灰水涂掉。我们并不退让，又在上面照原样写上红红的大字。

遵照党的指示，凡是抗战的都同他们搞团结。国民党教育部戏剧巡回教育第一队来湘潭，就主动去请他们办培训班，给我们传授音乐、戏剧、绘画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该队队长向培良（国民党C C系人物）、副队长朱之倬和文永若等，都给我们讲课。三民主义青年团湘潭分团演剧缺少小演员，我们就派李建坤、孙叔秋去充当剧中角色。

我们在湘潭一个多月，初战获胜。一位署名欧阳平明的在《观察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不可忽视的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正如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一样的小朋友们，能唱歌、能画、能写作，只要搭上小楼梯，他们就可以画出一些动人的图画来。在湘潭，他们是得到了一般人的称赞，老百姓对他们的印象更好……"湘潭的实业界、新闻界如廖镇楚、李尧阶等人士，曾在精神上、物质上赞助我们。小学教师贺明生，捐款十元；还把十二岁的女儿贺跃送来学习、工作。不少的儿童纷纷要求加入我们团，年仅十岁的李炎坤也从长沙远道赶来，成为当时团内最小的团员。

开展湘乡儿童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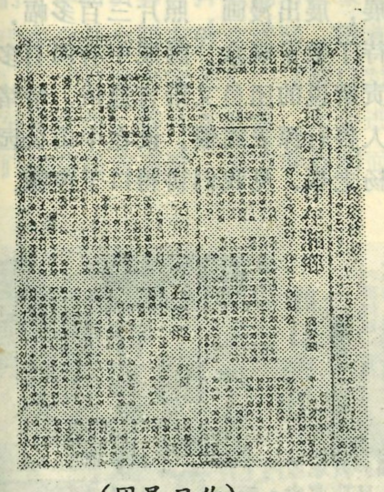
三月十三日，我们告别湘潭，到达湘乡，住进国民党县党部内。头几天，我们应邀出席了一些机关、团体、学校召开的茶话会，同时，开展了我们各个项目的工作。

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纪念日到四月四日儿童节（旧儿童节日），湘乡县举行第二期抗战宣传周。我们抓住这个时机，努力推动湘乡儿童抗日救亡运动。月底，我们邀请城关各校老师、学生代表及各民众团体负责人开座谈会，讨论怎样庆祝儿童节。有的小朋友说，过去的儿童节

是大人先生们替我们举办，我们只是吃糖果、饼干而已；今年，我们要自己办自己的节日。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由小朋友自己筹备，请大人先生们赞助，我团担负筹备工作的主要责任。四月四日那天，各校小朋友集会热烈庆祝。儿童们主持大会，发表演说，表演歌舞，气氛活跃而愉快。会上，以“湘乡儿童庆祝儿童节大会”名义，打电报给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拥护抗战到底；还致信前方将士，表示敬意和慰问。大家都把吃糖果饼干的钱连同募捐所得，慰劳伤兵，救济难童。我们又以团的名义，印发了《告全国小朋友书》、《告湘乡小朋友书》。大街上，我们出刊的大型墙报《儿童节特刊》，吸引着无数的观众。有些学校的小朋友，组成宣传队，和我们一起在街头讲演。当晚，我们演出文艺节目，招待了各校的小朋友。这一天，湘乡城沸腾了。小朋友们说，今年的儿童节，又热闹，又有意义。

为了进一步推动湘乡儿童运动，我们接着办了一周的“战时儿童讲习会”。由县教育局通知各校派代表参加。讲习会有两个内容：一是介绍全国儿童运动的情况，重点谈“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成立过程和工作成绩，也谈我们母校实行抗战教育及我团成长概况。这些是由几个团员分别介绍的，引起了代表们极大的兴趣。二是把我们所掌握的话剧化装、表演和识简谱的知识，画漫画的技巧等，向大家讲述或示范。虽然，在这些方面自己也很幼稚，但，团员们觉得能够为湘乡儿童工作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也就热心尽力去做。这个讲习会，时间短，实效多。参加的小朋友酝酿着要组织“湘乡孩子剧团”和“歌诵队”，进一步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在湘乡街头、广场，与各界联合公演或是去医院慰问伤、病官兵演出，我们的节目除有大量的歌曲外，还有《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最后一课》、《死里求生》、《炮火下的孩子们》、《两兄弟》、《哑剧》等戏剧节目。我们办的墙报“大家看”有特色。它是用九张或到十二张大白纸拼成，周围镶有三寸宽花边。篇幅大，图文并茂，美观而醒目。虽然毛笔字不佳，作画稚拙，但书写一笔不苟，画样生动活泼，群众很爱看。正如储石林在邵阳《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说：“……新加入的育英儿童工作团，他们以儿童的力量，而能倡成扩大、硕博的壁报，是可敬的。内容新颖，很迎合观众心理，可使读者知道未来的主人翁是伟大的。他们一定能发扬祖国的光辉。”由于墙报出得多，团员练习写作的机会也多。这时，团员邓寿观、罗孝荣（野草）也能写工作报导在邵阳《力报》上发表文章了。



（团员习作）

在湘乡期间，因有几个顾问调离，邓德润同志（女）被派来担任顾问。山东的袁炳南，宁乡的喻剑龙，长沙的奉文湘，湘乡的陈幼君（女）都先后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活跃在邵阳县城

四月二十一日，我们和省工委负责人高文华、周里一道，挤在一辆布蓬汽车上，向当时中共省委会驻地邵阳行进。在车上，两位领导同志询问我们工作近况，问我们想不想家，怕不怕飞机炸弹。他们态度和霭，使人感到亲切。

我们一到邵阳，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

当时，邵阳县城经常鸣起恐怖而凄厉的警报声，群众纷纷到郊外躲避敌机。我们利用这时间，象过去在长沙搞“庙山工学团”那样，在郊外开展了各项宣传。我们在中山公园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画展，展出漫画、照片三百多幅。八个团员负责讲解，一天接待了数千观众。画展中有两百多幅是日寇暴行真实图片，负责解说的团员又语言通俗，情绪激愤，观众受到感染，对敌人兽行深表痛恨。设在中山公园内的一家“濯清园”澡堂的杨老板，见我们讲得口干声嘶，累


工作努力

育英兒童團

（邵阳《力报》一组报导）

得汗流浃背，便主动送来茶水招待，还免费请我们全团洗澡。这次画展的宣传效果特别好，深得群众欢迎、喜爱。接着，我们又在城东、西、南、北四处流动画展，参观者达数万人次。

“五·四”青年节二十周年纪念期间，我们慰问了负伤将士；参加了几个社会团体发起的救济难民募捐公演；部份团员还参加了县组织的十公里长跑、爬山、讲演比赛，并得到了名次。

在邵阳各界欢送宝永区二团二营新战士出征的大会上，我们全体团员精神抖擞地站在最前一排，推出最小的一个团员代表全县小朋友致欢送词。接着，我们演唱了《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枪口对外》、《大刀进行曲》、《军民合作》等几支歌曲。大会进行中，下起了濛濛细雨，我们仍是昂首高歌。那节奏鲜明而雄壮的歌声，在雨幕中震荡，从数百个即将出发杀敌卫国的壮士们的行列里，爆发出阵阵掌声。


（《育英儿童》复制件存省博物馆）

五月中旬，我们出版了完全由自己编辑的《育英儿童》第一辑。书刊封面“育英儿童”四字，是田汉同志亲笔题写。书里有团的基本概况，前段工作总结，团员的自传和签名，各报发表的有关我团活动的部份文章等。这本

书为三十二开本，印数一千册。除赠出部分外，约有七百本由邵阳民众书店公开发行，每本定价二角。这本书所用纸张，又是邓克生同志慷慨捐赠。

我们和邵阳童子军战时服务团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也住在县党部前栋楼上，是邵阳第一个开茶话会欢迎我们的单位。我们共同参加过义演活动，并开过几次联欢会。共同抢救过被敌机炸伤的群众。由于来往频繁，战斗友谊日深。该团艺术辅导杜微心（后改名杜巴、郭亮）曾在《力报》上发表了题为《在工作中成长的孩子们 —献给育英儿童工作团》的文章，热情地称赞和鼓励我们。不久，他辞去童子军服务团的职务，来我团担任顾问。

新闻界《力报》几乎每天派人来我团采访，经常报导我们工作的情况。

邵阳各界人士中，有许多人对我们的工作支持和关怀。县政府里的一些公务人员，也捐款给我们添置宣传用物。湖南高等法院第四分院推事谭延美先生，听到了我们的街头讲演，激动得眼眶也潮湿了。他夸我们讲得好。说："看到你们，我相信中国不会亡。"说着，掏出两元法币塞在我们手上，表示他支持抗战工作的一点心意。当晚，他来看望了我们，并题词留念。这一切，都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在邵阳，邓顾问的儿子邓致忠、童子军战时服务团的路里以及从长沙赶来的毛俊湘、曹勤修、周洲、张焕华四位女同志，都先后来团，壮大了我们的队伍。六月初，我们又转战衡阳。

深入衡阳农村宣传

我们到达衡阳，住在市内成章中学。抗敌演剧二、八队

的哥哥、姐姐们也住在这里，对我们生活非常关心、照顾；特别对话剧的化装、台词朗诵等方面，更是尽力辅导。我们多次联合义演，从具体排练节目直到演出，在整个实践过程中，曾得到他们不少的教益。

在市内，我们分四组进行街头讲演、刷标语、搞画展。特大的"大家看"，张贴在中山路、刚直路的高墙上，更加显眼。人们顶着烈日，久久地围在壁报前面观看。

在衡阳，我们把工作重点摆在农村。距市区约三十华里的车江镇周围的村庄、集市，都深深印上了我们的足迹。

全团分成小组活动。有的访问群众，有的负责借阅图片书报，有的作小先生教唱歌、教识字……。我们所到之处，土墙上刷了标语，贴了漫画。"大家看"缩小了篇幅，张贴在车江镇上老百姓多的地方。我们露天演出节目，老大爷、老大娘忘了是演戏看，撑起伞上台给我们遮荫；有的农民伯伯搬出桌凳，让我们站上去讲演、写标语；端茶送水的群众更多，还有煮绿豆汤给我们喝的。

在二十天的流动宣传工作中，车江镇的父老们见到我们会唱、会跳、会写，不怕太阳晒，不怕蚊子咬，说："这群奶子（小孩）真是了不起！"离别时，送了又送，互相依依难舍。我们在车江镇的活动，大刚报、正中日报都即时作了报导。

我们在外流动半年了，有的团员体弱染了病，需回家治疗；有的要回校复课。因此，一批团员离走。新安旅行团的唐友华、黄正刚和育英学校学生孙月秋三人，补进了我们的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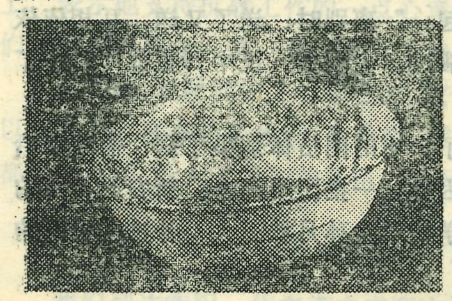
最艰苦的时日

七月初，我们来到临时省会——耒阳。

当时，正是"平江惨案"发生之后，国民党反动当局视我们团为眼中钉、肉中刺，马上施加压力。我团的"护身符"——军委会护照和九战区备案证书，在这里忽地"失灵"了。我们原想住进公房，可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以及县城内各单位，怎么着也不买帐。迫不得已，我们只好住到郊外野鹅塘一个破庙里。伪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听说我们来了，扬言要把我团解散。大家听了，气愤不已。主任干事李建坤，邀了几个团员代表，请孙伟顾问领着，一起去见朱经农，表示抗议。朱经农摆出一副臭架子，官腔十足："小孩子懂得什么抗日，还是解散回家读书吧！"我们的代表胆大，向他质问："全民抗战，包不包括儿童？"他气得面红耳赤，无话可答。从此，他不再提解散我团了。

我们每天照样工作，生活却越来越艰苦。

吃的，从过去一日两干改成了一日一干一稀。有时，一餐就是一小碗盐水煮蚕豆，哪还有菜吃。睡的，只有几扇庙门垫着。不知哪里弄来一些稻草，撒在神案前，我们就席地而滚。这破庙，阴暗潮湿，晚上蚊子更多。我们睡了又醒，醒了又睡，没睡过一夜好觉。烧柴困难，男团员去近处池塘洗澡，女团员可不行呵！邓德润顾问创造了一个好办法：她把脸盆盛满水，放在太阳下曝晒。晒了一盆又一盆，温的水由她安排使用。这脸盆，我们用它洗个脸，盛过菜，打过浆糊；此刻，又能热水洗澡，大家都珍爱这个脸盆。



（脸盆现存省博物馆）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奔走劳累，一到耒阳又处在这样困难的生活环境中，多数团员已病倒了。没病的体质也很不好，还要坚持工作。顾问们鼓励大家，以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和前方浴血杀敌的战士为榜样，坚持团结奋斗，战胜疾病，度过难关。

我们更加互助互爱。谁家寄钱来了，都拿出来买药给病号治病；锅底下的稠饭，盛给病号吃；仅有的一两床小蚊帐，让给重病号用；外出宣传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向病号问候。大家亲如兄弟姊妹。我们团，既是一个战斗的集体，又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就这样团结奋斗，度过了多灾多难的一个月。

边工作、边整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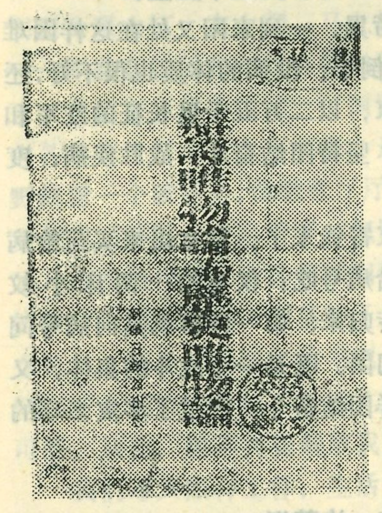
八月上旬的一天，一个叫谭先生（不知名）的，领一辆汽车把我们接到了茶陵，并介绍住进了已放暑假的茶陵师范学校。这所学校环境优美，校舍宽敞，与野鹅塘小破庙相比，判若天地。我们一到这里，顿觉心旷神怡。

当时，刘岳厚先生主办的《开明日报》社址，就在学校对面，与我们只有一个操坪之隔。报社的大编辑、大主笔经常来看望我们。刘岳厚先生还特意把他的侄子刘立朝送到我团工作和学习。《开明日报》创刊那天，我们全团出动在大街小巷叫卖报纸。闲着到报社玩耍，那些大人先生常把我们

的小团员搂在怀里问这问那，非常亲热。

我们边工作，边整训。

顾问们遵照省委指示并经干事会研究决定，举办学习班。按年龄和文化程度分为两个组。低年组以学文化为主；高年组除学文化外，还要学习哲学、时事政治等。课本有：《战时儿童国语选》、《大众哲学》、《通俗辩证法读本》、《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老百姓穷苦的原因》、《苏联革命与中国抗战》、《中国儿童史》、《少年艺术史》等等（附注：长沙和平解放后，孙力君同志将我团残存的一百八十七种共二百一十本图书，献给了当时的"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因"文革"时流散，上述书籍迄今未能查出）。学习方法是听课、讨论。孙伟、杜微心、邓德润三位顾问和《开明日报》姜缦郎、骆何民、骆家俊、郑家弘等老师，曾给我们授课，辅导。章东岩同志来茶陵，也讲过一堂时事政治课。课后的讨论会非常活跃，人人发言，有时辩论激烈，最后组长总结。



（团员张若曦珍藏的一本书）

我们经过一个半月的学习，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大有提高。年纪大的团员收获更大；他们增强了一种信念，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一定能够成功。

这一段时间的学习虽然紧张，但也作了不少工作。最突出的是去城郊各处军营进行慰问演出。驻军的傅军长热情接见了我们，还资助了我团一部分经费。

九月中旬，省工委派潘开茨同志到茶陵，向顾问们传达了新的任务。于是，全团奉命走上了湘北最前线。

慰问湘北战地军民

我们回到了久别的母校——长沙东乡育英分校，待命。

新墙河畔不时地传来隆隆的炮声，我们这群无家可归和有家不归的孩子，每天照常工作、学习，聆听顾问讲述苏联国内战争中，苏联少年英雄们的战斗故事以及军事知识，大家并不觉得当时紧张的战争气氛使人可怖。不久，湘北会战结束了。我们立即入城，把"文夕"大火劫后的母校——保节堂街育英总校立为团部驻地。学校校舍已破败不堪，街上尽是废墟、瓦砾。夜间全市漆黑，一片惨淡景象。

这时，抗敌演剧二、八队和剧教一队都回到长沙，我们联合举行了几场公演，并开展了其它宣传活动。一度沉寂的长沙又活跃起来了。

十月上旬，省工委指派我们去慰问湘北前线军民并作战地调查。接受任务后，团决定派遣奉文湘、张若曦、张业裘三人组成调查组先行。他们在日军曾侵占过的福临铺、新市一带，调查了一些敌寇暴行和我军民英勇抗击的事迹，作了"战地见闻"的纪录。黄俊顾问连夜创作出《湘、鄂、赣是我们在干》、《保卫洞庭湖》等歌曲，团员们赶排新节目。中旬的一日，全团出发，一个个赤脚草鞋，顶着秋风冷雨，行进在湘北的泥泞乡道，沿路向军民演出慰问。第一站宿营

高桥。剧教一队随后赶到与我们会合，在高桥、金井同台演出几场。这时，田汉同志到湘北视察，接见了我们两个队伍的全体成员。他身着戎装，脚登长筒马靴，神采奕奕，对我们倍加称赞，并勉励大家作好慰问演出工作。孙伟顾问把我团出版的《育英儿童》第一辑送了一本给他，感谢他为这本书的封面题字。离开金井，我团与剧教一队分了手，奔向更远的前沿阵地。

在脱甲桥的一次演出，从下午一时起，连演两场，直到红日西沉，夜幕降临，观众仍不肯离散。台下掌声、呼声不断，硬要"再来一个"。我们来不及卸装，齐唱了《游击队歌》、《洪波曲》、《打杀汉奸》三支歌，观众才满意地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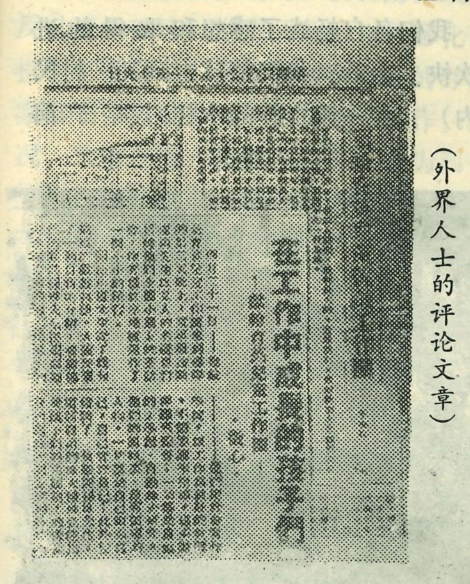
另一次，在靠近营田的白竹坳村上演出时，敌机两次来袭（没有下"蛋"）。战士们也两次散而复聚，听歌看戏的情绪异常热烈。当敌机第二次飞走时，台上的幕布就拉开了。这一场，足足演了三个小时。

在湘北的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的高级将官们，如总司令关麟征，各军、师长张耀明、陈沛、张汉初、董煜、覃异之、赵公武等，都分别接见并宴请了我们，还捐赠我们一些钱、物。他们专派辎重营战士为我们一站一站地运送行李。营田的驻军，把缴获的钢盔、军刀，还有写着"武装长久"的膏药旗、防毒面具、日军的护身符和金属小佛像等，送给我们作纪念。

我们和湘北的小朋友们分别开过几次联谊会。为他们表演节目，展览图片、漫画，还把一批书刊分赠他们；同时，倾听他们讲述当地人民破坏道路、阻滞敌军行动、配合守军

英勇杀敌的故事，以及对日寇暴行的控诉。有几个团员写下了战地见闻杂记。

我们在湘北流动一个多月，行程千余里。仅十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日半个月中，即演出二十场。国民党军某团的李亦炜先生，以《写给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为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在《国民日报》上刊载。文章写道："……这次远来前线作慰问表演的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在本团演出的节目，计有《军民合作》、《到游击队去》、《上海小同胞》等剧及舞蹈、歌咏。剧情的紧张，动作的活泼，表情的真切，歌声的悲壮，使每个观众的情感随剧情演变、歌声的抑扬，一弛一张，真是恰到好处，无懈可击，可称是近来艺术界的一个奇迹……"这次，我们的确满载而归，胜利地、愉快地完成了演出慰问湘北军民的重大使命。



（外界人士的评论文章）

庆祝建团周年和新年元旦

我们从湘北前线返回长沙，已临近团的诞生周年和新年

元旦。为了好好庆祝这两个节日，我们不顾旅途疲劳，又积极地做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

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穿上了新制的童子军服。头戴船形帽，两脚扎绑腿，一个个身子笔挺，分外精神。建团周年的庆祝会，简朴而隆重。孙伟、黄俊、杜微心三位顾问都讲了话，总结了全团一年来的成绩；他们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工作，把抗战进行到底。我们各自畅谈了感想和取得的进步，庆祝会开得生动而欢快。会后，我们整队走到又一村民众俱乐部（今青少年宫内），在一座古朴的木柱小亭子前面，合影留念。



（全团合影、照片存省博物馆）

一九四〇年元旦，我们和剧教一队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了庆祝晚会，向群众表演了游艺节目。接着，我们开了一个招

待会，向各界人士报告本团一年来的工作，展出了我们带回的前线战士缴获的战利品。

兵分湘、桂两路

一年来，我团努力工作，得到了社会的好评，也引起反动当局更加注目。当时，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已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湖南的政治空气恶化，我们的处境困难。根据省工委指示，采取隐蔽和分散的办法。疏散一部分团员回家读书，只剩十五个团员留团工作。团的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取消各股，改组干事会，分为两个工作队。由奉文湘任干事会主任干事兼第一队队长，康明超任副队长；罗孝棠任干事会副主任干事兼第二队队长，孙阜民任副队长。于是，我们兵分两路。

农历大年初四，第一队十二个团员，在黄俊顾问率领下，离开长沙，奔赴桂林。当时的桂林，不仅是广西的省会，而且是祖国大西南文化的中心。文学艺术界许多知名人士汇集这里，儿童团体的老大哥"新安旅行团"以及"广州儿童剧团"、"厦门儿童剧团"也都来到这里工作。我们与这几个兄弟团体会师，感到格外亲切和兴奋。我们相邀举行联欢会，交流开展儿童运动的经验，探讨提高团员文化、艺术水平和政治水平等问题，各自表演短小精采的节目。以后，我们四个兄弟团体举行联合公演，开展其它形式的宣传活动。并肩前进，团结战斗。

我们一到桂林，就拜访了党在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和文化界的前辈们。如《救亡日报》社长夏衍，广西艺术馆馆长欧阳予倩以及张铁生、张志让、邓克生、曹伯韩、李仲融、杨

东纯等，得到了他们亲切的鼓励和热心的教导。欧阳予倩为我们戏剧表演作了些示范动作，张志让给我们作了时事报告，我们更忘不了许多著名艺术家的关怀和帮助。舞蹈家吴晓邦，经常来到我们驻地独秀峰下，教给我们舞蹈的基本功，耐心细致地指点和纠正动作，指导我们排练了《义勇军进行曲》、《青春之歌》两个集体舞。演剧四队张客同志，从柳州来桂林治病和我们住一起。当他知道我们正忙于筹备义演时，不顾自己身体有病，帮助我们导演了儿童剧《胭脂井》。画家周令钊，经常来指导我们作画，我们预告义演的巨幅宣传广告画，便是他精心绘制的。

"四·四"儿童节期间，我们的工作更加活跃。十二个人的小队伍，为救济难童一连义演三场，还招待桂林小朋友演出一场。每演一场，座无虚席。演出节目，歌、舞、剧各种表演艺术形式都有，尤以《黄河船夫曲》表演唱最受观众欢迎。戏剧家张客，带病参加我们义演，担任舞台监督。三个兄弟团的小战友，一起包下了前后台的工作。特别是舞蹈家吴晓邦，登台表演了单人舞《义勇军进行曲》，为这次义演增添了政治和艺术的色彩。

"五·一"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中国汽车制造厂工会和广西大学学生分别邀请我们去演出，受到了工人伯伯叔叔和大学生哥哥姐姐的热情欢迎。在中国汽车制造厂，老工人曾痛心地告诉我们：这个厂，名为中国，实为四大家族的企业。宋美龄就是董事长。所谓汽车制造，只不过是把一些进口的零部件组装一下罢了。工人们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工资微薄，待遇低下……工厂的所见所闻，令人愤慨不已。大家漫谈收获，决心抗敌救国，将来一定要建设一个强

大的国家，不再受外敌欺凌。

"五·四"过后，我们在桂林市郊巡回宣传半个多月，在那里，和衡阳车江镇一样，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由于我们工作努力，《救亡日报》、《广西日报》都发表我们宣传活动的消息，连一贯反共的《扫荡报》也作过报导。

我们在桂林四个多月，生活也很困难。住处搬了四次，最后才在独秀峰下一栋竹棚子里安下身来。我们年幼没经验，轻信别人，二百元伙食费被骗走，不得不自己煮饭、买菜、办伙食。当濒于断炊的时候，西南行营政治部副主任梁寒操和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曾给了我们一些补助。

我们离开桂林的前夕，舞蹈家吴晓邦特地选了一家最好的照相馆，和我们合影留念。谭伟同志介绍了一个由南京流浪到广西，在湘桂铁路当车僮的营震，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六月初，我们告别桂林，回到长沙。

第二队，人虽不多，工作很积极。孙伟顾问为了便于开展儿童工作，趁着已停办的私立学校复校的机会，恢复了市内的育英学校，担任校长。以原市立十三校为校址，招收了两个班的学生，让育英儿童团和育英学校并肩工作。但这件事遭到长沙县教育局局长任正凡的干预，育英学校被迫改为市立第三小学，孙伟仍任校长，直到他离开长沙。

第二队三个团员活跃在市区，参加了戏剧界为救济长沙会战营田等地殉难最烈的遗族而举行的义演和慰问伤员义卖报刊的活动。春节期期，与育英学校学生组织宣传队，去陆军医院为伤兵作慰问演出。特别是和三民主义青年团长沙分

团、九战区精忠服务团联合发起，成立了长沙儿童交谊会。还经常组织参加交谊会的遵道、循道、明智、金庭、育英和几个市立的一些小学，作抗日宣传、慰问伤兵难民、捐募义卖等活动。长沙的儿童工作如此活跃，我们的第二队真出力不少。

统一安置　计划撤退

我们两队集中后，湖南的政治形势逐渐紧张起来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历来视我团为"防范"的对象，加上我们一年多来在湘、桂两省宣传活动影响很大，他们更是对之虎视眈眈。顾问们的处境十分危急。省工委及时派杨第甫同志通知孙伟，作好团员们的安置工作，即速离开长沙。孙伟、黄俊两顾问和干事会研究后，将孙月秋、舒淑纯、李国坤、李竟仁、黄正刚五个较小的团员护送回家；罗孝荣、孙阜民、张业裘、周洲四个团员介绍到长沙青年会游行工作队工作；康明超、毛俊湘、贺跃三个团员则联系去了演剧八队（杜微心顾问离团后在该队任队副）。路里自愿回苏北参加敌后工作。留下奉文湘、张若曦、管震三个团员坚守阵地，不到最后时刻，决不离团。一切安置好了，黄俊顾问先离长沙去广西。接着，孙伟顾问去重庆，转赴延安。

坚持到最后一刻

我们三个留守的团员，在白色恐怖日益猖狂的情势下，坚信抗日救亡无罪，抗日需要我们战斗，决心把工作坚持到最后一刻。因此，我们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沉着、积极地工作，也警惕着可能发生的事变。

我们坚持作了以下几项工作：

继续巩固长沙市儿童联谊会组织。我们与各小学及战地军人服务站主办的儿童读书班等单位联系，坚持每星期六下午各校轮流主持联欢会和街头宣传、救济难童、义卖报纸等活动，从中培养新的儿童骨干。

我们招收三十名儿童成立了歌泳队，教他们学会抗战歌曲，去街头宣传。抗战三周年前夕，我们领着这个队，抬着几大桶石灰水，用扫帚当笔，在中山路柏油路面上刷写抗日标语，从小吴门一直写到湘江边。还组织他们到茶楼酒馆进行劝募活动三天，把所得百元全部交给救济部门救济难童。

继续办好宣传刊物。"七·七"、"八·一三"、"九·一八"、"双十"纪念日，我们的大型特刊，张贴在小吴门、水风井、又一村几处要道上。我们汇编好了的《育英儿童》第二辑文稿，已无法印刷出版，只好改成半月一期的三十二开油印小册子，取名《育英通讯》。把它印发到各个儿童团体，交流工作情况。

我们还兼任循道、明智等小学和其他儿童组织的义务教员，并协助主持长沙青年会少年儿童部的工作。

这一阶段，我团成员虽然大部已遣散、撤退，但，我们坚持了工作，团的声誉并未削弱减退。社会人士仍然关切我们。国民党、三青团中的某些人，也对我们很感"兴趣"。他们派人盯梢，调查我们外出的活动；一些不明身份的人也常来"造访"，盘问孙伟的去向，翻阅桌上的书报……。这一来，我们想出了一个"找上门去，主动出击"的对策：一面向第九战区政治部书面汇报工作；一面推奉文湘到国民党省党部动员委员会找龚雨苍，向他口头汇报工作，并征求意

见。结果，逼得龚雨苍说出了一句话："你们工作不错，同意你们干下去。"奉文湘趁机对他说：我们原打算开招待会的。请你把我汇报的情况转给三青团和有关部门知道。我们也不再开招待会了。"另外，当时《正中日报》的徐浩，《阵中日报》的张弓和《前进报》的伏笑雨，都对我们表示友善，我们与之联系密切，争取了新闻界的支持。经过这番工作，那些"特"字号人物在一段时间内，不敢公然对我们加以迫害。

在那物价高昂、法币贬值的年代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开支，单靠九战区每月五十元的补助费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又不曾向社会人士募集过经费。刘岳厚先生知道了我们这种困境，主动地拿出四十元相助。这真是雪里送炭。

十一月下旬，我们得知"新安旅行团"被迫解散的消息，预感到反动派的黑手也会向我们团伸来。事态果真这样：

十二月上旬。我们接到由宋庆龄主持的"中国儿童福利会"发出的征集儿童作品送往苏联参加国际儿童作品展览会的通知，便通过长沙儿童联谊会的组织，向各小学布置了这个工作；而伪市政府、三青团则秘密通知各校立即停止这一活动。他们称育英儿童团都是"共产党崽子"。通知中横蛮规定，凡我团发起的任何活动，一律不准参加，更不准与我团来往。与此同时，我们又接到了第九战区政治部停发团生活补助费的通知。我们终于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从政治上、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被迫停止活动。

建团两周年纪念

在长沙的团友们，都怀着一种沉重而骄傲的复杂感情，

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建团两周年纪念日，借小四方塘青年会礼堂，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向各界人士报告了我团两年来的工作；感谢爱国的、进步的大人先生们对我团的各种方式的支持；也说明了我们目前的处境。青年会总干事李振声、演剧二队队长吕复都讲了话，他们表示赞扬、愤慨和婉惜。我们用最后一场歌舞表演答谢来宾。末了，宣布：停止工作。

建团两周年纪念日，写在团史的最后一页上。但，抗日烽火下的这簇奇花，并没有因此结束生命。她分散在祖国的大江南北，继续吐露芬芳。

（原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团员

奉文湘、张若曦、李炎坤搜集整理）

追述私立咸嘉小学

退休教师　胡董午

从长沙市溁湾镇西行约五里处，有个咸嘉湖（原名韩家湖，解放前属长沙县岳麓区云母乡，今西郊）。二十年代初期，私立咸嘉小学诞生在这个湖畔，我父亲胡文典（1889—1967）便是这所学校的创办人。他毕业于善化高级中学，后又在长沙市国民七校（火宫殿）任校长职。因工作无保障，失业后还乡办学。

灾患频仍　犹艰苦创业
初衷不改　惟育才兴邦

学校取名咸嘉（韩家湖的韩家雅化），父亲自有用意。他认为，只有普及教育，全民有了文化知识，国家才会繁荣富强。到那时就“都好”了。他为了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身体力行，白手起家，在家开馆办塾。开始只有八个学生。1924年，因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就向长沙县政府申请备案。批准后正式招生，收取学杂费略低于当时规定标准，分三班进行复式教学。还聘请了黄芷谷、贺益寿（安江一中退休）和冯汉元三位老师，自任校长并兼课。

就在这年，韩家湖水位暴涨，将祖遗老屋改建的三间教

室及教师住室全部淹倒。父亲打捞了一切可用的建筑材料，在老屋后山上新建两层楼校舍一栋。有教室、教师住室、学生寝室各四间，还有办公室等，约计面积九百平方米。新校舍落成不久，因地势较高，又遭狂风暴雨袭击。屋顶被揭，山墙岌岌可危。父亲去城内请来摄影师，照下几张风灾实况相片，呈请县府救助，结果枉费了心机。父亲只好四方借贷，抢修校舍复课。

一九三四年冬，一个北风呼啸、凄寒苦冻的深夜，学校猪舍突然起火（原因未查明），顿时烟火冲天，瞬息即将延及老屋住宅。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幸附近村民赶来奋力抢救，才免遭大难。

建校后的十年间，正是艰难创业阶段，无情的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来。父亲坚定不移兴办教育事业，逆来顺受，煞费苦心。他自撰一联挂书斋中，联云：“能受天磨成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以此自励。

这阶段虽迭遭灾患，但教学工作已初具规模。表现在：1、学生入校后，除了坏习惯，学了好样子，变得文明有礼。2、学生对语文有兴趣，学了古的，也学了新的。当时除教国民小学课本外，还选印了部分古代和现代名人的佳作如《桃花源记》、《木兰诗》、《五柳先生传》、《陋室铭》和《荷塘月色》等作教材，根据各年级学生接受能力进行讲解。3、重视书法课，从中年级到高年级一律习钱字帖，悬腕、立着写。学生写的字，横竖分明，有架势，进步很快。每期还举行书法竞赛，选优张贴欣赏，并略授奖品鼓励。4、学生学笔算，又学珠算。学了笔算可考学校，学了珠算会算帐。家长对此非常满意，学校的声誉也日益扩大。

筹资扩校 应抗战需要
严谨办学 树一代新风

抗战初期，市民为避空袭，纷纷迁移乡下。渫湾镇、三汉矶、银盆岭、望城坡、大冲、小冲、乌山、谷山、黄花港等地学生纷纷前来就读，学校竭力收纳。并另设分校一所，赁渫湾市铺上袁仁和杂货店大厅，用篾条间开作教室，容纳几十名学生。尽管多方张罗，也难竟全功。

在这学生人数猛增的情况下，教室、宿舍、食堂、课桌椅等都不够用，特别是教师很难找到。父亲单枪匹马，迎难而上。这时，我已从古稻田省立二中中师毕业，作了父亲的助手，担任学校主事。从此，繁重的教务全交给我和我中师毕业同学易钟煦（铁小退休）、朱范庠、曹天问、（龙王宫小学退休，病故）我大妹胡重鏁及其同学向惠文等共同襄理。父亲则全面抓校务，主要抓财政。开辟财源，扩建校舍，添置校具和教具；组织生产，养猪种菜，自力更生。原被大水淹没过的荒坪，变成了常年碧绿的菜畦。以前寄宿学生不多，只有我母亲一人做饭。这时，已请了三个校工，分别担任煮饭、种菜、养猪，母亲仍协助炊事。所种的菜可供百多师生食用；养猪卖出的钱，作为购买建筑材料和付给泥木工工资等用费。父亲还管理伙食。当时学生每月缴米三斗，假日扣除。收取伙食费比其他学校规定标准稍低，伙食节余部分补贴给老师和工友作伙食费用。总之，学校财经管理是以校养校。正如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教书、吃饭。"他曾自撰对联一付："人生唯有读书好，世上无如吃饭难。"这联是请学生家长近代书法家周介裪先生书写，悬挂在堂屋

内。

教师队伍也随之扩大。先后来执教的有胡重年（家妹，华中美专毕业，在曙光小学退休、）、毛菊隐（湖大毕业，病故）、杨南陔（湖大毕业）、王成格（湖南教师进修学院退休）、袁翯（湖南师范学院退休）、吴肖宗、黄石华（女）、邹诛德（女、北大学生、地下党员、解放后在省总工会工作，病故）等老师。他（她）们都有一定的教学水平，思想好，境界高。能耐劳吃苦，不计个人名利。对学生言传身教，事业心强。教师的报酬不论学历、能力，每人月薪银元十块（法币贬值时则按十块银元折算发给谷米），伙食由校方供给。从没有谁计较待遇。

为了适应教学需要，于一九四〇年秋又扩建校舍一幢。分上下两层：底层为大礼堂，兼作风雨操场；上层有教室、教师住房各四间。另有楼梯间分由两个梯子盘旋上楼。上下两层总面积约七百六十平方米。此次扩建校舍实为教学急需，动工前并无充足资金，只能边建边筹。又是父亲多方奔走借贷，才把四面土墙筑好。当时已是秋尽冬来，连日风雨交加：眼看筑墙被雨水冲刷，行将倒塌。父亲一筹莫展，病倒床褥。幸得学生家长丁义生先生慷慨解囊相助，才将瓦盖上。丁先生这一义举实在难得！

学校扩建后，校舍连成一片，巍然耸立，颇有气派。校舍前面修竹成林，四季长青；后面枫林高耸，杂木参差，春季郁郁葱葱，经霜满山红遍；特别是右侧沿塍一带，遍植梅树。腊月花开，雪白耀眼。阵风吹过，纷纷扬扬，如雪花飞舞；左边是操场，有低低土塍环绕。土塍上松杉流翠，野花喷香，间植有栗枣等树，果实累累。校园环境清幽绚丽。莘

莘学子，学于斯、游于斯。既能专心攻读，又能陶冶性情，更好锻炼体魄，确是读书好处所。

学校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生活学习，秩序井然。紧张、严肃、快乐、活泼是学生行动的口号。校舍墙上写有醒目的美术标语。当晨曦初露，学生迅速整理内务，大同学帮助小同学把被子叠成方块形，四边棱角分明，整齐又清洁。寝室内挂牌子，每天都有值日老师检查记分。洗漱完毕晨操、早自习、早餐，就餐前整队入食堂。先各就各位站好，由值日生司口令：立正——稍息——开动。食堂四壁贴有"食不语，寝不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字样标语。就餐时，食堂鸦雀无声，很少掉饭粒的。午后稍睡。每天课毕举行晚会。晚自习毕，由老师集合学生总结一天情况，表扬好人好事，提出应改进的地方。周会、晚会集合，学生做到了快、齐、静，一个个象小兵一样，挺精神的。会前唱校歌："韩家湖畔，岳麓山边，有我们的乐园。流不尽的湘江水是我们活命的源泉。新知识，输入我们的脑；新生活，担上我们的肩……"接着还唱一些抗战歌曲或儿童歌曲，如《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太行山上》、《卖报歌》等。散会前原地踏步、蹦跳，一面高呼："锻炼身体，保卫祖国"、"水里水里钻，火里火里跑"、"时刻准备着：上沙场，杀尽鬼子才收场。我有铁和血，哪怕敌人刀与枪……"学生那种生龙活虎的情态，至今仍令人悠然神往。

学校每周都有中心训练，内容有爱祖国、爱公物、礼貌、诚实、勇敢、友爱等。根据每周训练内容，定出五至六条写在小黑板上，挂在办公室旁边，让学生明确具体要求。

利用周会、晚会结合讲解条文，讲述中外名人故事，也发动学生自己讲道理、谈心得。内容丰富，教育形式生动、多样。周末进行检查、总结，评比先进个人和班级。这项工作学校抓得很紧，培养了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形成了紧张、严肃、快乐、活泼的校风。

学校从开办起就设有劳动课。每周一节，按照学生年龄、体力不同情况，分别指导治虫、浇灌、翻土、收割等。最小的学生也参加拔草、拾菜叶，让孩子们养成劳动的好习惯，并学会一些普通的农业生产知识。

学校也注意组织学生课外活动。因距离岳麓山、银盆岭较近，春游、秋游，参观湖南第一纺纱厂（今长纺）是经常的。学生欣赏了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瞻仰了历史名人的墓地，听到了老师讲述的爱国故事和对名胜古迹的传说、神话；又看到了规模巨大的厂房、机器……活跃了思想，打开了眼界，增强了热爱祖国的情感。这些为孩子们喜爱的校外活动，在他们金色童年生活中，留下了最深刻、最美好的记忆。

另一课外活动是出刊。学校聘请有写作、绘画才能的学生担任低、中年级周刊的编辑和小记者，发给他们聘书。周刊基本上做到了图文并茂，特别做到了儿童化。新刊问世，总是引来成群的校内外读者。附近驻军第九十二师二七四旅五四七团团长幸我，经常带一些官兵来校观看周刊、与师生进行球赛。他们听到孩子们宏亮雄壮的抗战歌曲，看到了整个学校显示出来的朝气蓬勃的英姿，无不交口称赞。他们临开拔时还特意赠送一座银盾给学校留念，上面镂刻有"民族幼苗，国家基石"八个大字。

在教学工作上也作过大胆的尝试。学校地处乡村，有的学生年龄偏大，而其中多数是读了几年私塾、算术从未入门的。他们连阿拉伯字都不认识，更谈不到写和算。对这样一类特殊学生，学校采取了灵活的教导方法。把他们暂编一年级听课，课余由教师补习。达到同级学力的可以随时升级。这个办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解除了家长的忧虑。还有，高小毕业班每周增开一节英语课，教授拼音和一些简单句式。这样，对那些难以继续升学即将踏入社会工作的学生，多少有一点好处；对能继续升入中学的学生，也能打点基础。

为了教好学生，尽管学校财经拮据，也千方百计添置了部分图书和教具。父亲买回的那架风琴，为活跃校园作了很大的贡献。还有《幼童文库》全集、《小学生文库》全集、动植矿画片、中外地理挂图等，在授课中也起了较大的作用。父亲自幼酷爱藏书。经史子集俱全。还有佛学、医学书籍，均系线装。鲁迅、邹韬奋等左派文学作品以及其它进步杂志也有不少。这类书籍常供教师们自学、参考（以上书籍全毁于兵燹与“文革”）。前长沙著名书法家陈觐龙老先生曾书赠联云：酒不能豪偏好客，米犹难索爱藏书。寥寥十四字，确是父亲爱书如命的真实写照。

身陷敌巢　为掩护同志
横遭折辱　因不从寇军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学校掩护了一批地下党员，如易岫篆（女、总工会退休）、方敬容（女）、陈光耀、张竹如（女）等同志，他们风风火火，来来去去，有的任教几天

就走了，至今还不知道真实的姓名。一九四○年夏，国民党特务来校搜捕邹咏德老师，我机警地掩护着要邹老师从学校后山逃走。结果，特务捉不到他，却把我和我妹重蝶逮捕了。我们姊妹俩过了七日七夜的拘禁生活，后经舅父出面铺保才被开释。

长沙第三次沦陷时，汉奸领着日军来校威逼父亲复课，父亲坚决不从，被穿着马靴的寇军儿脚踢倒在地，昏厥一阵。当他醒来时，汉奸、寇军已扬长远去。他连夜逃往宁乡避难，学校便无人看守。以后，日军马队驻扎在学校，把校舍、校具糟塌得不象样子。待归来时，只见残垣断瓦，衰草丛生，一片荒凉景象。

光复前夕，父亲筹谋复课。这时，我因事一度离开学校，教务交由重燕（省十二师毕业、市十二中退休）、重年两妹负责。直至长沙和平解放，我才返校。

广育英才　遂平生夙愿
申请接管　献一片丹心

我父亲一介穷儒。筚路蓝缕，以创建咸嘉小学。既无基金，又无祠产学租，更无政府津贴。虽历经天灾兵祸，受尽折磨苦难，而矢志不移。三十年来，他能团结广大教师，教导后辈勤恳执教，为乡梓造福，为国家琢育人才。一九四九年八月喜获和平解放，他更怀广育英才的壮志。无奈年已花甲，病体难支，只得促我去市教育局请求接管。经过我多次要求，魏泽馨局长于一九五一年三月派员来校，正式办理了接管手续。移交两层楼校舍两幢，总面积约有一千六百六十平方米。其余食堂饭桌，寝室床铺，教室课桌椅、办公室书

柜等校具，也全部清点移交。移交时，父亲欣然地说："我力不从心了。今后有党的领导，'咸嘉'一定会多出人才！"

从此，私立咸嘉小学改名为长沙市咸嘉湖小学。一九五九年郊区政府首次组织千人治理龙王港时，父亲又欣闻韩家湖更名为咸嘉湖。他曾深有感慨地说："这该是'都好'的时候了！"

一九八五年九月于岳阳

附：难忘的咸嘉母校

区政协常委 **李炎坤**

我非常庆幸自己：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抗战年代，投入了"咸嘉"的怀抱。

那是一九四〇年春季，我家逃难到长沙西乡。方圆二十多里地，只有"咸嘉"是一所完全小学。"咸嘉"的老师知道我参加过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给了我一点优遇：在学生人数达到最饱和的情况下，允许我报考；考后又当场计分宣布录取，编入五年二期，还让我跳了班。那年代，大批的儿童失学、流浪、逃亡……，不用说，我真够幸运了。

入学的第一天

我家离韩家湖十多里，必须寄宿学校。入学的那天，爸爸送行李。到了校先缴米、缴费。老校长亲自收费、称米。米过秤的时候，秤杆往下倒，秤砣差点儿滑落地上，准是少了斤把几两。老校长私人办学，并不计较。只听他细声说："这个月的，算交足了。"

我们去宿舍，路过老师的办公室。我看到那玻璃窗上插着给我的一封信，感到很奇怪。拆开一看，一纸竖行的信笺上，端端正正地写着三行毛笔字：

兹聘请
李炎坤同学为校刊编辑
校长 胡文典

校长的名字下面，盖有一颗殊红的方印，金灿灿的。它，特别耀眼……。

晚上，寄宿同学都挤在两间教室自习。教室里，灯火辉煌。灯、油都是自带的：有的用竹筒，有的用破瓷缸，有的用茶杯口大的铁锅、瓦锅……灯具各式各样；燃料多用棉油或桐油，很少有用清油(茶、菜油)的。只有老师们才点煤油灯盏。象我这样从来没带过灯油的，随便挤到哪里，同学们都争先让坐。就寝了，全寝室的同学睡在一个大木床上，一个挨着一个。老师住隔壁，贴着我们睡（各寝室都一样）。熄灯后，静悄悄的。我第一夜躺在"咸嘉"温暖的怀抱里，心里极不平静……

我们一天也离不开她

一个手摇的铜铃，发布着全校行动的命令。掌握摇铃的，便是学校主事胡重午老师。她，身材修长，举步稳重；明眸皓齿，待人总以笑脸相迎。同学们一接触她，都觉得可亲可敬。

那年夏季的一天，学校出了事：

邹泳德老师（中共地下党员）正上我们的数学课。她站在讲台上，一眼透过玻璃窗，察觉楼下办公室里有人在骚动。她慌忙离开教室，披件浅兰上衣，下楼奔向后山……下课了，学校顿时充满了紧张、恐怖的气氛。全校师生，还有附近的一些农民，挤在办公室门口，面面相觑。我在人群中打听：有人说，国民党派人来抓邹老师……还说，胡重午老师有共产党嫌疑……胡重蝶老师也被带走了……。真的，这三位老师都不见人影了。

当时，我对"共产党"这个词并不陌生。我在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时，不是有人说我们的顾问都是共产党的吗？可他们有才能，有胆识，积极宣传抗日，有什么不好的呢？这一来，我倒对这三位老师更加敬重了。我最敬重最想念的是胡重午老师。是她，每天朝会、晚会给我们作报告；是她，教给我们唱《吕梁礼赞》等抗战歌曲；也是她，深更半夜给我们盖被子；更是她，手把着手地教我编校刊。她喜欢在刊头上一笔连续勾出许多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弧线，又在上面画上一大一小象英文的"V"字。她说，这是两只雄鹰，在密集的云层上空展翅高翔。她爱雄鹰，也希望我象雄鹏那样迎接未来的生活。

自从胡重午老师被抓走，同学们日夜想着她，心里空洞洞的，象失去了什么。一天、两天……七天过去了。忽然，两位胡老师就要回来了的讯息不胫而走，同学们喜出望外。大家排着长蛇阵，站在曲曲弯弯的五里长堤上，候着、盼着。果然，两位胡老师姗姗走近了。几天不见，她们变得黑瘦、严峻，张张小脸向着她们，几百只眼睛涌出了热泪。我们高兴得鼓掌、跳跃、放鞭炮。胡重午老师回校了，铃声更加清脆、响亮……

摇篮、乐园、家

同学们学语文的兴趣最浓厚。学校自编油印的活叶讲义使人喜爱：有文言、有白话；语意隽永，耐人寻味。我们学

过《桃花源记》，只需个把早工，都能背得烂熟。吴肖宗老师教我们语文课，他全身长着白绒毛，乍见怪可怕的。但他态度和蔼，知识渊博。他生理上的特征，谁也不拿来取笑。他还教我们书法课，把范字写在黑板上。平时，都临摹钱南园字贴，写字一天比一天进步。我从小是练黄（自元）体、欧（阳询）体的，吴老师并不强求一致，鼓励我独具一格。每次选优张榜，总有我一份。

学校的环境实在太美，充满了浓郁的诗情画意。站到二楼走廊上，可以眺望远方的湘江、岳麓；近处，可以看到韩家湖中碧波荡漾；眼前呢，梅枝伸向走廊边，鼻尖可以碰到梅果。顽皮的同学装作一副馋相，把梅果舔了又舔，但谁也不去攀摘。都知道，到了收获的那天，太师母少不了要给我们几个。竹林里清晨读书、月夜游戏、炎夏乘凉……，是我们课余活动最好的场地。球场挨着它。莺飞草长的季节 春笋也钻出地面。没长眼睛的篮球，免不了要碰倒它们几个。“肇事”的同学连忙捧来些黄土，小心翼翼地把受伤的笋头扶上。

我喜欢与坐在前面的一个女同学打闹。她，胡重午老师的小妹妹，老校长的娇女儿，名叫胡重念，我老叫她胡念。有一回她正踢毽子，我有意逗着玩，夺过毽子飞腿就跑了。她在后头紧追着，差点要哭了。正好追到教室拐角处，两人与迎面来的胡重午老师撞了个满怀。胡念趁机哭诉。胡老师明白了底细，抚慰着心爱的小妹妹，笑着说：“‘别打油’了”，随即瞟了我一眼，“看，他给你了。”我不好意思地把毽子还给胡念，三人都会心地笑了。

次年夏季，学校举行讲演比赛。竹山上，讲台高筑，听

众云集。真不巧，比赛的前一天，我的嗓子突然嘶哑了。老师和同学们都为我犯愁不已，自己也失去了几分信念。赛前一刻钟，太师母捎信叫我去一趟。走到她房里，一个带盖的大瓷缸捧到我手上。我揭开盖子，温温的清水里，沉着两片船形的青叶。我呷了一口，甜丝丝的。“喝吧，喝了嗓子好的！”太师母向我慈祥地微笑。我大口大口喝完了，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她：太师母整日守在厨房里，洗碗，切菜，没见她到过教室，她怎么也知道我参加讲演比赛呢？……那次比赛结果，我荣获第二名奖状。

我在“咸嘉”读了三个学期，每期期末考试都名列前茅。高小毕业后，我怀着万分留恋的心情离开了母校的怀抱。那里，紧张、严肃、快乐、活泼的校风，曾经给我薰陶和启迪，给我智慧和力量。虽然，我的年事日长，人生的道路坎坷、曲折；但，只要我想起“咸嘉”的生活，想起在那里辛勤劳碌、赋有崇高的献身精神的园丁们，我就感到快慰，获得鼓励。呵，难忘的咸嘉。我的摇篮，我的乐园，我的家！



经济史料

长沙市乳牛事业发展概况

退休干部 成少枚

我从一九五六年一月到一九七三年七月，一直从事乳牛、乳制品生产工作。在这长期的工作中，我从陌生到熟悉，从外行到内行。对于长沙市乳牛事业的发展过程，基本上了解一些情况。

乳牛事业的新兴阶段

长沙市的乳牛生产，实际上是从郊区发展起来的。

解放前，据我所知，在市郊有许多牛行，比较著名的是舒家牛行、甘家牛行和胡家牛行。它们利用杂屋、猪栏作牛舍，饲养食用牛或替牛贩代养。除了北郊姚家巷北果园的舒家牛行外，没有哪家喂过乳牛。

舒家当时的掌柜舒兴和，养了三头乳牛（洋牛），每天只产奶三、四十斤。由于当时没有大量的牛奶供应，群众也没有喝奶的习惯，舒家的那点少得可怜的牛奶，只能每天派人专门送到韭菜园圣经学院、北门外湘雅医院和雅礼学校，卖给外国人了。这就是长沙市最初乳牛生产的状况。

解放后，特别是一九五三年，党和政府发出“生产自救”的号召后，各行各业的生产迅速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生活习惯的改变，牛奶的销售量有所增加；再加上从事这项事业所需要的投资少，设备简单，而且收益快，有利可图。于是，郊区兴起了众多的私人乳牛作坊，养的多是当地产奶的土母牛。

在这种情况下，长沙市工商联合会着手开始引导组织乳牛、花卉和养鸭三个部门成立“长沙市农艺饲养业同业公会”，隶属长沙市工商联领导，并配有专管干事一人。乳牛业纳入组织后，发展迅速，形势喜人。同业人员戏称自己搞的是“七十二行以外的”职业。

一九五六年一月，在对资改造的高潮时期，长沙市人民政府批示，由长沙市郊区供销合作社负责，对“同业公会”以合作化形式进行改造。我就是在这时受郊区供销社之托，以工作组的名义，进入乳牛行业的。同年二月一日，我将分出的乳牛业组成“长沙市第一牛奶生产合作社”，由原同业公会的主任陈春华任社长；“长沙市第二牛奶生产合作社”，由周远智任社长。

当时，这两个合作社，共有私人牛奶坊八十一户，一户一个经理。另外有股东七人，从业人员十四人（基本系亲属），职工（看牛娃）七人。这些牛奶坊分布全郊各处：东至五里牌，南至金盆岭，西至左家垅、赵洲港，北至新码头、文昌阁、上大垅、丝茅冲，共有牛二百八十八头，良种乳牛（洋牛）十三头，种公牛一头，其余全是本地不能春耕的土牛婆。牛奶年产量为二十三万斤。

我们遵照“长沙市对私改造办”的指示，按牛头数及挤奶、饲养工具折价，共计资产四万二千多元，以百分之七的年息定付七年赎买（后又增加三年年息）。核定资金在二千

元以上的焦占桐、孟昭举、钟学文、舒志高等，划为资本家，按工薪制每月四十二元。其余统称“私从人员”，每月十五元。此时，乳牛生产已正式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独立行业。

由合作社变为公私合营企业

这个解放后兴起的新行业，同业人员极其复杂，大部分是解放前的商人、伪军、警、宪及旧职员等人。据该行业的一位干事张国南介绍：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私人牛坊偷税漏税、在牛奶中掺水等不法现象非常严重（甚至掺入沿街太平缸内的水），经卫生防疫站检验，有的牛奶掺水竟高达百分之七十四。

组织合作社后，非法经营被堵住了。也有一部分人思想有抵触，提出退资退社，要求回家单干。如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周克勤就拉走了牛奶第一社三头乳牛和一头牛犊，回家私养。事情发生后，我即时报告了曹瘐市长。后经有关单位协同劝说，周克勤才将牛送回合作社。

由于从业人员思想抵触，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牛奶产量显著下降。牛奶第一社还勉强能够维持，而牛奶第二社则亏损一万五千元。市有关领导视此情况决定，改变改造形式。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了“公私合营长沙畜牧场”，由市供销合作社领导。我被委派为该场的首席公方代表，彭国俊同志协助我的工作。

我们在一九五六年的上缴利润中，拿出四万元作为建场基金，用一万五千元为牛奶第二社还清债务，剩余的二万五千元，在南郊树木岭刘家冲建了一座新牛场。这座新牛场有

砖木结构（大部分是土砖）的牛舍三栋，牛床位一百八十六个，另有饲料仓库和消毒间合共一栋。还有办公室和食堂合共一栋，总面积一千五百六十平方米。除河西㮾湾镇龙王桥的四十多头牛未动以外，其余各处的牛都集中到新牛场统一饲养、统一管理。一九五七年当年的牛奶产量，由一九五六年的二十七万斤提高到四十万斤。

抓生产的同时，我们还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发动全体场员检举揭发坏人坏事、使乳牛生产得以巩固发展。

扩大饲养场、开创新工艺

公私合营后，长沙市的牛奶供应仍然紧张，尤其是对于老、弱、病、婴，更是供不应求。为了提高牛奶产量，逐步解决供需矛盾，我们提出要实现乳牛全部良种化。一九五八年上半年，由南京引进一头较好的荷兰种公牛，为更新良种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之后，又陆续从哈尔滨、上海等地，多次引进良种公牛和青犊母乳牛。到一九六二年底，原合作化时入社的二百多头土母牛已全部更新，牛群总数有三百头，牛奶年产量为八十万斤，比一九五七年的年产量增加了一倍。

我们又进一步扩大乳牛饲养场地。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将树木岭牛场建筑材料全部拆迁到五里牌原长沙市养禽场旧址。共新建和改建牛舍六栋，可容纳乳牛近四百头，并更换场名为“长沙市乳牛场”。

在此同时，省畜牧兽医研究所建立牛场，有良种乳牛二百多头；市综合农场乳牛场有二百多头，韶山路公社赤岗冲乳牛场和东方红大队牛场共有一百多头。连同“长沙市乳牛

场”的，全市乳牛总数近千头，牛奶年产量越二十万斤。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当时市场鲜奶供应紧张的矛盾。

这以后，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我先后多次赴北京、武汉等地牛奶公司，学习提炼奶油和制作“干酪素”的工艺手法，在我市开创了乳制品生产的新工艺。一次，我看到食品工业内部刊物上，刊登了内蒙古某单位用土法铸管烘干生产奶粉的经验介绍文章，便和沈继成、吴炳云及市副食品公司同志一道，远访内蒙，学习技术，生产奶粉，为我市食品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现在的“湘江牌”奶粉，就是在那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产品。

接着，长沙市乳牛场又将河西矿冶学院侧长沙市林场（今东方红农场乳牛场）接收作为分场。新建拱式型牛舍四栋，饲养良种健康牛群。一九七一年九月，又有几个单位合并到长沙市乳牛场，将场名更为“长沙市牛奶公司”。我调离公司时，良种乳牛存栏达五百头，年产牛奶超过一百二十万斤。回顾自已参加奶牛生产十七年多的历程，长沙市奶牛事业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令人欣喜的，我深信这个新兴的行业，在将来人们食物结构大改变后，它一定会被誉称为“后来者居上”。

河　西　园　茶

市志办　罗立德

茶字古作荼，以其味苦涩，谓之苦荼。唐代中叶，开始盛行饮茶。陆羽嗜茶，著有《茶经》三篇，全面论述茶树品种、制茶方法和饮茶用具，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都很大。茶叶含氨基酸、儿茶素、咖啡碱等，汤色碧绿，气味馨香，不只是很好的饮料，而且有解酒、治喘、祛痰、消毒、治高血压、促进消化等食疗功效。

湖南产茶历史很早。唐、宋时推行以茶易马的政策，湘茶便被政府征课，用以与西北兄弟民族交换马匹。宋代每年课湘茶便达二百四十七万余斤。宋、元间人马瑞临撰《文献通考》载：“宋制买茶之处，湖南则潭（今长沙）、澧（今澧县）、鼎（今常德）、岳（今岳阳）。片茶有独行、灵草、绿芽、片金。金茗出潭州。”明洪武五年（1372年）改潭州府为长沙府，府属长沙、善化、湘阴、浏阳、宁乡、安化等县都是著名产茶县。长沙更以水运之便，成为全省茶叶集散地之一。原产黑茶运销西北一带，海禁开放以后，始产红茶运销外洋，绿茶则供本地销售。

河西园茶系本地消费品种，因产区分布在湘江西岸岳麓山至白沙洲一带等河西地区而得名。沿河一带丘陵起伏，河

湾港汊多，土质泥沙并蓄，既渗透又返潮，适于种植经济作物。且兼靠近城区，肥料取给，产品销售都甚便利，因而竞辟桔园。农户在房前屋后，以及零星坡土，辟出小块茶园，也有在桔园间种茶树。旧时聚少成多，有一定商品量。建国初期年产商品茶约近六万斤。

河西园茶品质优异，除土质、水源等地利因素外，焙制方法也独具特色。正宗河西园茶，系将青叶炒至七成干便进行揉制，然后摊在茶坑上用火煨枫树球、黄藤根、桔树皮烟熏，称作烟熏茶。这种茶外形条索紧细，银毫显露，汤色澄黄，滋味清香。建国后收购部门不收烟熏茶，改为不经烟熏，径行烘烤，称为烘青茶，茶叶清香气味渐少。随后又改用铁锅连续炒干，谓之炒青茶。焙制方法渐趋简便，而河西园茶的本色特质也随之蜕变。然而农村及城市老年人，仍爱饮烟熏茶。

河西园茶因采摘季节不同，有春茶、夏茶之分，产量各约占百分之五十。春茶中细茶较多，占春茶产量百分之八十左右；夏茶中粗茶、细茶的比例约为四比一。春茶有“清明前茶”、“谷雨前茶”，采摘初春萌发的嫩芽焙制，茶质细嫩，气味芬香，然而茶汁若含苦涩。夏茶则因外在雨水少，茶叶本汁较纯，茶味回甜。故有“头茶苦，二茶涩，三茶好吃天又热”的民谚。过去消费茶叶量较大的厂、店，常选用夏茶中带有一芽三叶的“子母茶”。河西园茶历来以销售长沙为主，其次汉口，后也外销港、澳。

明代陈耀文撰《天中记》载有：“凡种茶树必下籽，移植则不生，故聘妇必以茶为礼。”长沙旧时民间婚娶也有送“茶礼”的风俗。

乡土风情

盐龙寺与四和尚

区政协委员　萧金铃

由长沙市区过湘江，沿着去乌山麻石古道西行约三十华里今国营东方红农场延农、长丰两管区交界处，昔有一古刹，名曰盐龙寺。据善化县志记载，该寺创建于宋代，迄今已千年之久。笔者祖居寺侧肖家花园，儿时常爱来此嬉戏、观赏，当时所见所闻，至今犹依稀可记。

盐龙寺占地面积约二十多亩。建筑古朴，风景秀丽，神话、传说甚多，历代屡有修建。

古盐龙寺并非此处。相传寺南二百多米处原有一坐北朝南小庙，善男信女拜佛求神者多，乌雀常将残香剩烛衔至玉池山（即寺址），遂顺随鸟意，迁庙扩寺。

盐龙寺原为三进两横大庙。头进山门为玉池山，缘地形若墨盘。至清咸丰时，山门倒塌，庙宇重修，改两进两横寺观，更名盐龙寺，寺门两旁对联为“灵通盐井，气壮龙池。”门首设南岳辖神镇庙，同龛供奉，韦驮望佛。正殿设大雄宝殿，地藏王、观世音及诸天神象分立两旁，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两边配殿有案公祠、文昌阁、关圣殿，财神宫，均系金身佛象。全庙以案公祠香火最旺。案公祠神象有头无身，传说被两堂冤案所杀，神封新阳、潆新二案威福鉴观大帝。

其一新阳神，乃乾隆戊戌大旱时，闻寺对岸（雷家药铺）井中有金鼓声，掘出铁铸神面数十尊，背镌有新阳字，神名由此而来；另一瀿新神，则为修建瀿湾桥时出土，送来寺内合龛供奉。故称其为二案。如遇旱年，祈雨屡应。每年九月二十八日神寿，席开近百桌，周围数十里赴席者以湘粉、饲养业者居多。人传二神能驱瘟摄疫，庇佑六畜兴旺。寺正中有一古亭。重檐八角，四凤攀皂，一百根园木构成，形如鸟窠，风格独具。寺址当坳风而多白蚁，寺中木质（包括神象）多被白蚁蛀蚀，唯独此亭例外，故有鲁班下凡所造神亭之说。寺内南边横屋作僧人用房。

寺外左侧有一小潭，传说潭壖崖内有盐龙送盐。盐龙按当日僧数、每人一调羹，无多无少。后有某僧贪心，挖大盐崖，意将余盐出卖。盐龙发怒惩其贪欲．事后不再送盐。此寺因传说有盐龙送盐而得名。

寺四周古木参天，阴翳蔽日。红叶枫，飞蛾树数以百计。寺塘边细叶枫与案公祠后红椆树，三人牵手尚难合拢。寺前近有门闩岭，远有圭峰。若登上远近峰顶，俯瞰寺上四角鳌鱼，历历可睹。因风拂树，绿浪蛟腾，实为景色宜人之胜境。

古代文人、学者多游于此。悬于老方丈禅堂“龙伏玉池”四个赤金大字，浑厚圆润，摆布均匀。古亭上“妙德莹然”匾额，苍劲有力，为晚清著名书法家何绍基题写。文昌阁内“调元赞化”与关圣殿前“日星河岳”八个镏金大字，均系晚清书法家黄自元手书。关云长象前楹联：“生蒲州，转豫州，镇荆州，一片丹心照今古；主玄德，弟翼德，仇孟德，千秋浩气贯乾坤”字迹工整。处处名人书法，寺院为之

增色。

盐龙寺，乃佛神合一、荤斋同供。聚居僧人，多至数十。香火田分布于附近伏龙寺、洗心庵一带，每年收租谷百多担。民国年间，寺内北边横屋，先后设有短期义务小学与保国民学校。前厅左边作为“乐善团”积谷仓，每年青黄不接之际，向贫民低息放粮，秋后收回。

笔者曾目睹禅堂客厅正面墙上悬挂当年老方丈体非和尚画相，赞联为“体非和尚，心是如来”。体非徒弟契因禅师，在寺中设帐多年，蒙馆教读。契因曾收徒四个，法名雪童、雪岩、雪印、雪疑。前三个先后夭折，独雪疑成人。因进寺排行第四，人称四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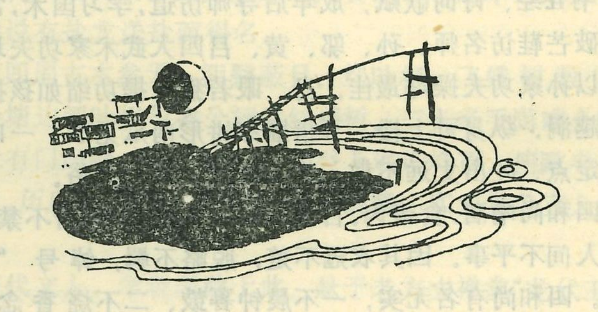
四和尚，俗名张克訾，湘阴人。四岁出家为僧，幼时专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成年后寻师访道，学习国术，常自言要踏破芒鞋访名师。孙、邬、黄、吕四大武术家功夫均受教练，以孙家功夫操习最佳。身、眼若猴，提功缩如孩提．飞身能越涧，纵身可上楼，五指擢穿饼形南瓜见子，一口唾液按预定点，吐出丈远不散。能文能武，非同凡俗。

四和尚嗜酒，食诸肉。自谓“修身不修口，禁身不禁手”，爱理人间不平事。因其衣冠不楚，脱略不羁，绰号“四疯子”。四和尚有名无实，一不晨钟暮鼓、二不烧香念经，生活有睡、坐、跑、教武循环往复规律。睡，可连睡两年，只进食，少说话，不外出；坐，可连教两年从馆，手不释卷；跑，可连续两年上山采药，进户治伤，百病俱医，分文不取；教武，曾免费收教四批徒弟。

四和尚收徒条件：择其主持公道、受人欺侮、体弱多病、心地善良不易动情者，愿收为学徒。教武前先教药，按不

同文化程度教以治伤药学。故徒弟出师后，既获一般武艺，又略知治伤。当地老人中，至今多有当年四和尚学生、弟子，笔者亦是其中之一。

星移斗转，时过境迁，四和尚一九六二年已归东土，盐龙寺古迹荡然无存。昔日玉池山，今已鳞次栉比，面貌全新。变为延风中学，现郊区职业中学。



朱家花园与新河

昔长沙有家巨富，名曰朱云谷堂。据说主人原籍安徽，在湘经营淮盐致富，落籍长沙。以其雄厚家财。做过几件大事：如兴建朱家花园、修石板路、开辟新河。

朱家花园有两所：一所在长沙市郊小吴门外；一所在东乡离城约六十余华里之棠坡。论其规模，棠坡较市郊者为大。棠坡周围约两华里，中间一座山坵，顺着山势布置各种林木、花卉、池塘、屋宇。场地广大，屋宇整齐，而游人稀少。民国初年即兴办一所初级小学，名曰时中。至民国十年扩大为完全小学，增设高小两班。师资设备与县立小学不相上下。附近数十里以内学校举办春、秋季远足旅行，多以时中为目标。因为可以游览花园，又得观摩教学。

相传当年朱家老人颐养于此。每日佣人往来城市，采购食物，必须准时到达。若遇春雨连绵，道路泥泞，行走困难，则经常误点。他一时兴至，即将此条六十多里路面，铺修一线石板。行人或独轮土车从石板上通过，则较泥路顺畅得多。往昔，物力维艰，运输困难。石板须从距离数十里之丁字湾凿掘以人力搬运而来，完成一段石板道路工程，可算一椿壮举。

朱家老人笃信风水，居地棠坡固然经过一番慎重选择，祖宗坟墓更是苦心陪衬。相传他家发塚，在长沙北郊一山坵

上。经堪舆先生研究：要保持永久巨富，必须山青水秀，藏风暖气，并得“玉带缠腰”，加以封锁。所谓玉带缠腰是地理形势一个贵格，即堂局内有一衣带水相绕。远看之，正如一根腰带紧系全身。遂建议于墓前开辟一条河流，以便造成这个墓地贵格。因过去土地不归政府管制，只要有钱则可以尽量收买，朱家就斥资开辟一条运河，引浏阳河之水流入湘江，并命名曰“新河”。

（郊区政协委员陈登甲供稿）

陈海鹏

倡建五里堤、饲养新河鸭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长沙城去湘西宁乡、常德等地古道，北面须渡新河绕营盘岭直上；南面经猴子石渡河绕渔湾镇；较直路程则由大西门渡河，经溁湾镇、龙王港再过渡至望城坡。由龙王港至望城坡一段系浅滩河。春夏之间，湖水上涨，灌入龙王港外溢，则滩河积水，使行人、商贩非船渡不能直达。当时驻长沙总兵陈海鹏在新河屯兵数营。陈系望城坡人，为便于行人往返，乃募资役使士兵疏浚龙王港下游，建龙王桥、望岳桥以泄湖水。又在两桥之端筑堤直达望城坡，此堤名为五里堤。行人称便。昔龙王桥侧建有龙王庙竖碑纪其始末。现庙毁碑亦不存，去宁、常有公路可通，五里堤只留下历史痕迹。

陈以军功为总兵，家居常宴客。因湖南鸭瘦，乃就新河侧围堤养鸭。下游鱼虾、蜉蝣及萍藻丰富，鸭食之肉嫩颇肥。每供宾客，多所赞美。当时有人戏拟一联云：“欲吃新河鸭，须交陈海鹏。”后陈之孙亦有祖父风，有人改前联云：“欲吃新河鸭子，须交陈海鹏孙。”

（省中医学院易建纯供稿）

编　后

《长沙郊区文史》创刊后，受到了郊内外不少读者的关注，这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个莫大的鼓舞。现在，第二辑又出版了。我们恳切地希望广大的读者，不吝指教，多加批评。

这一辑，仍编有五个栏目。原《英烈传略》暂停，新增《回忆录》。全辑刊出史料十八篇，其中大多属于"三亲"史料。辑里，有郊籍同志各方面的回忆文字，也有郊内有关部门的供稿，还有郊外同志撰写我郊的史作。作者广泛，说明大家都热心支持这个刊物。我们一定不负众望，努力改进工作，不断提高刊物质量，把《长沙郊区文史》办得更好。

本刊登载的《抗日烽火下的一簇奇花》（上、下）一文，承蒙省图书馆古籍部、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省博物馆资料室供给资料、实物拍制图片；省顾委委员戈明同志两次审定史实，谨在此表示深挚的谢意。又政协委员黎品娥积极提供史料线索；长沙基础大学刘小华同学来我会实习，多次走访作者，协助整理文稿，也一并致谢。

编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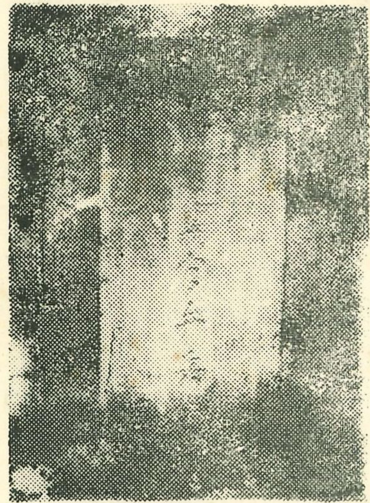
长沙市郊区

文化遗存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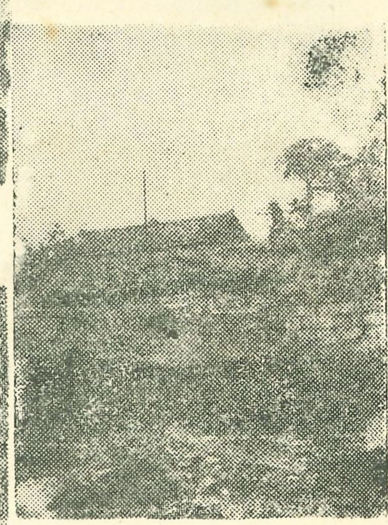
（之二）



△ 该墓主碑



△ 另一墓碑



△ 清陕西忠义官、弁、兵、伕合墓、位于南郊石马铺彭家垅。图为该墓全景。

封面设计　朱赞时
封面题字　萧金铃

长 沙 郊 区 文 史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郊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 部 发 行）
责任编辑　火　原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